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文明城市
- ②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③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 ④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⑤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⑥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⑦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⑧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⑨ 中国市场名城
- ⑩ 中国地热城
- ⑪ 中国书法名城
- ⑫ 国家园林城市
- ⑬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⑭ 国家卫生城市
- ⑮ 国家森林城市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刘振本
 钱 进 尹传贵 赵 强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王庆和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高来臣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粉碎日军在山东的新“扫荡” 徐向前 04

【峥嵘岁月】

鲁中抗战：整风学习 高克亭 07

海军陆战队激战穆陵关纪事 石绍庆 12

铁军大帐追歌行（四）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16

【名人素描】

从绿林好汉到八路军传奇司令（上）
 ——记刘海涛 王卫东 王 欣 22

国学大师王献唐 戚海莹 25

【文化掇英】

左丘明与《左传》 王红霞 29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三）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33

【探索发现】

抗战旧址之——山东抗日军政学校 本 编 36

钢八连连长鄢思甲 高 雷 37

【蒙山沂水】

王璟的传说 微莒南 42

琅邪稻 平 凡 46

【诗画赏析】

刘中策、刘中瀚书法及佚名画册（上） 高 昂 48

【影像沂蒙】

我在山东省立托儿所的日子 艾鲁林 50

【文史论坛】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下） 赵 炯 52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二） 赵丹峰 56

【典籍考辨】

丁守存和《编年自记》（中） 丁兆铭 62

【文明之星】

中哈边境线上的临沂老兵
——记魏德友 何 军 张晓龙 69

【沂蒙名医】

创业者之歌
——记左振素 胡爱军 73

【史志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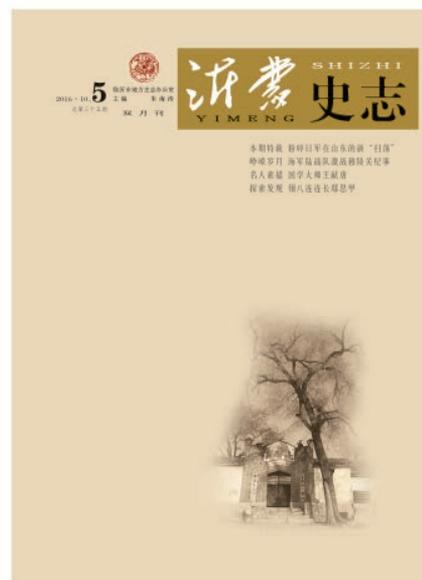
80

封面： 山东军政干部学校

（详见本期《抗战旧址之——山东军政干部学校》）

封底： 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也。

《荀子·礼论》 /胡石 书



地 址： 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 276000

电 话： 0539-8727560

邮 箱： 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 <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 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粉碎日军在山东的新“扫荡”

徐向前



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明显增加，愈演愈烈。这种相持阶段的“扫荡”与战略进攻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我们称之为新“扫荡”。

我对当时这种“扫荡”的特点作了如下的概括：

- (一) 敌人把后方转变为前线；
- (二) “扫荡”是不平衡的；
- (三) 敌人以堡垒形成巩固的点和线；
- (四) “扫荡”次数增多，时间短促；

(五) 以“游击战”对游击战；

(六) 实行烧杀与封锁政策；

(七) 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等等。

针对敌人新“扫荡”的特点，我军采取游击、破袭、麻雀战等作战手段，不断给敌人以有力打击。

下面，是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战斗。

苗山战斗（1939年6月）：六月下旬，日伪军三百余人进占莱芜的苗山。我纵队一个连，乘敌在河里洗澡的时机发起突袭，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后敌从莱芜城调来援军，我军依托山地，与敌激战竟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迅速转移。共歼敌百余名，俘敌数十人。

大郝家埋伏战（1939年7月）：大郝家位于龙口至招远的公路附近。据侦察，敌每天有汽车通过。七月三日，我纵队一部以集束手榴弹埋在公路上，设置伏兵，一举炸毁敌汽车三辆，毙敌中川清秀指挥官以下三十余名，缴轻机枪一挺，长短枪四十余支，子弹三千余发。

梁山伏击战（1939年8月）：七月间，我一—五师一部在泰西、运西地区，经东平、宁阳等战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八月初，敌从津浦线抽调炮兵一部和步兵长田敏江大队共六百余人，经汶上向梁山一带进犯。我一—五师一部六百人在梁山附近设下伏击圈，将该敌包围全歼，缴获大炮三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步枪二百余支，创造了以相等兵力全歼优势装备敌人的模范战例。战后，敌疯狂进行报复，出动五千余人及汽车百余辆、装甲车四十余辆，对鲁西平原反复“扫荡”。我军利用青纱帐掩护，不断袭击敌人，仅一次战斗即毙伤敌二百余名，毁汽车十余辆、装甲车三辆。历时一个月，终于使敌人的“扫荡”失败。

冶源战斗（1939年9月）：冶源为临朐县的重镇之一，有日伪军一百余名盘踞。九月十一日我纵队一部向守敌发起突袭，激战三小时，攻克该镇，歼敌五十余名。

五井战斗（1939年10月）：十月二十五日，青州、临朐守敌日伪军四百余人出



徐向前在指挥战斗

动，向五井我军驻地突袭。我军顽强抗击，在增援部队配合下，经一天激战，将该敌击溃。缴获轻重机枪四挺，长短枪三十余支，子弹五万余发，毙伤俘敌青州守备队长有田以下近二百名。

泰山反“扫荡”战斗（1939年11月）：十一月上旬，敌从泰安、莱芜、博山等十一个县，出动步、骑、炮兵两千余人，兵分八路，向我泰山根据地腹地合击。在一周时间内，我军采取侧击、尾击、奇袭等战术，打击敌人。经金牛山、陈林、马鞍山、大王庄、龙磨角、章莱路、下游庄等一系列战斗，共歼敌近三百人，使敌人的“扫荡”破产。

总破袭战（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为粉碎敌人的冬季“扫荡”，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我鲁南、鲁西、鲁北、胶东各部队，发起总破袭战，破坏敌人控制的铁路、公路，袭击重要据点，牵制和迟滞敌人前进。六次破袭战，共破坏铁路、公路数百里，炸毁火车一辆、桥梁十余座，收割电线一千多斤，零星歼敌数千名。

孙祖战斗（1940年3月）：三月中旬，沂水、朱位、东里店、铜井、莒县五个据点的敌人，出动四百余人，向我纵队司令部活动的岱庄、孙祖地区进击。我们调山纵二支队及一个交通营，在孙祖和铁峪一带山地设伏。十六日战斗打响，激战两昼夜，共毙伤日军二百余名，缴获一批马匹、车辆、武器弹药等。

白彦战斗（1940年3月）：一一五师为巩固和扩大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初，南下郟（城）马（头）平原，攻克郟城。三月间，复挥师费西地区，与敌三次争夺重镇白彦，歼敌八百余人，开辟了费县、滕县、邹县、曲阜、泗水边根据地。

抱犊崮反“扫荡”战斗（1940年4月）：四月中旬，敌人调集邹县、滕县、枣庄、峄县、临沂、费县等地的日伪军八千余人，对我抱犊崮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一一五师主力与地方武装配合，一个月内作战三十余次，毙伤敌二千二百余人，粉碎了这次“扫荡”。

反“扫荡”的零星战斗几乎天天进行，不可胜数。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军民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共进行大小战斗二千余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二万名、伪军二万五千余名，破坏公路一万二千里、铁路五百余里，击落敌机三架，击毁兵舰一艘、汽艇七只，炸毁汽车八十六辆、火车头三十六个、列车车厢一百六十二节。这些胜利，充分显示了敌后游击战的强大威力，显示了我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战斗意志，使日寇一次次的新“扫荡”均告破产。我军愈战愈强，在战术思想、指挥艺术、战斗作风、组织纪律性等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这样，就为我们向更大规模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方向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中抗战：整风学习

高克亭



抗战时期的高克亭（中）

鲁中区的整风学习运动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基本结束，前后有3年多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42年初，党中央提出了开展整风学习，主要目的是彻底清算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在全党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重要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由此揭开了全党整风运动的序幕。

4月，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接着又于6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各级党委，按照中央指定的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学习运动。在此之前，刘少奇来山东指

导工作，在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作的报告及帮助分局所作的山东抗战4年工作总结，就体现了党中央整顿“三风”的精神。5月8日，山东分局正式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整顿“三风”指示的决定》，山东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并在此后半年内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分局规定，从5月10日起至10月10日止，以5个月的时间作为学习和讨论文件的时间，此后即转入检查工作和鉴定党员。鲁中区党委在分局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整风运动。但由于当时敌人“扫荡”，斗争环境极其恶劣，整风学习时断时续，未能普遍地展开和坚持。

1943年4月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山东分局据此于4月18日发出《关于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规定整风为山东的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实现的决定性任务。接着又于6月1日和6月22日连发两次补充指示，使山东整风运动掀起热潮。

根据山东分局的要求，鲁中区党委、军区下大决心开展整风学习活动，为此成立了以罗舜初同志任书记，霍士廉同志和我先后任副书记，华楠同志任学习秘书的学习委员会。

学委会以指导中心组学习为重点，带动一般学习组。为了适应敌后分散性游击战争的具体环境，一般以3至5人为一组，平时实行每天两小时学习制，青纱帐期间实行半日学习制，每个人都要写好学习笔记和发言提纲。

5月，区党委和军区在沂水县的中高湖村召开科团级以上干部大会，布置动员整风学习，开展“坦白反省”，检查思想，检查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民主检查和批评与自我批评。

为了在鲁中迅速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区党委于6月召开了各地、县委组织部长会议，传达党中央的22个整风学习文件，培养组织领导整风学习运动的骨干。会议开了近两个月，我受区党委委托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人员除了认真学习上级规定的有关文件外，着重开展了“整风坦白”活动，同志之间开展了诚恳、坦率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部分同志都深刻地剖析自己，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分析个人的思想状况，检讨非无产阶级思想。现在回想起来，许多同志在那次“整风坦白”中都是极其认真的，批评别人不讲情面，检讨自己不遮不掩，而且唯恐自己挖掘思想问



题不深刻。这次整风学习运动对提高鲁中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推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起了重大作用。

11月，区党委和军区又发出了关于开展整风学习的指示，强调：这是今后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为了贯彻区党委的指示，我带一些同志再次到泰南区，向地委传达了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和要求，检查并部署了那里开展整风学习的活动，组织大批干部到党校整风轮训，并开办了整风训练班，培训县、区级整风骨干。

在整风、整顿党组织的过程中，鲁中区及所属各地委针对本地斗争实际和党组织的状况，做了党组织的整顿恢复工作。如泰山地委在被敌“蚕食”伪化的地区，结合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对党员进行了严格审查，妥善处理“自首”的党员。同时结合整风，各地还开展了整理改造支部工作，保证了党支部中贫雇农成份的党员占优势，进一步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布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指出，整风的主要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罗荣桓同志根据山东处于敌后，不同于陕甘宁边区这个实际情况，主张不能照搬延安经验。

康生的《抢救失足者》小册子传到山东，罗荣桓同志果断地指示不要下发。对这种用大民主方法检查领导，暴露清除内奸的做法，罗荣桓同志是有顾虑的。决定只在一些领导力量较强的单位试点，不普遍展开。并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山东各地发出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同时报告中央和毛主席。他首先要求把整风当做审干的基础，而不能把两者混在一起。为了把整风与审干加以区别，他提出要克服在民主座谈中形成的领导与群众对立的情况，对民主检查方式，不普遍采用，只限于鲁中、鲁南、滨海地区机关实行。关于以“暴露”为主的问题，罗荣桓给中央的电报“关于民主检查的检讨”中说：发扬民主当成了暴露，在审干方面可能引起政治问题扩大化，这“检讨”，实际上否定了“暴露”方针。这种用民主检查方法暴露内奸的做法在山东实际上被搁置起来。鲁中区党委机关执行整风审干的指示，领导方式上用大民主方式，发动大家提意见，所有工作人员，包括伙夫、马夫都参加。

由于“左”的倾向影响，成立了主席团，领导民主检查运动，区党委交了权，负责同志都不参加“主席团”。当时区党委确定在军区政治部搞民主检查试点。

“主席团”的成员多是原山纵宣传大队的同志，年纪轻，热情高，但对党的政策领会得不深，掌握得不够稳妥。民主检查开始后，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完全失去了领导权，“主席团”要怎样就怎样，有的同志不仅在会上辱骂，还张贴了许多大字报，画了漫画，说周赤萍同志是政治部的恶霸。在这种气氛下，政治部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了。一天深夜，周赤萍跑到我的住处，满腹牢骚地说：“今晚在你这里避避难，这是什么整风学习，明明是整人嘛！他们除了没说我是汉奸外，什么都说了，连我的警卫员也不跟我了。”

我对军区政治部一些同志的做法也很不赞成，认为那样搞对工作很不利，而且大敌当前，怎能自己搞乱了自己。即使对周赤萍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应该有人格污辱。我安慰了他几句，劝他说：“别着急，大家提意见，是想帮助你。你是领导同志，要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埋怨罗舜初政委在政治部搞试点，是有意整他，我跟他解释了不少，劝他冷静些。但他似乎没听进去，怒气未消，要去找罗荣桓同志。后来，他跑到山东军区机关，见到了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他说：“我干不了了，你把我撤了吧。”

肖华同志严肃地批评了他：“你把机关工作撒手不管，跑到这里来，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像个共产党员吗？像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吗？”

周赤萍原想诉说冤屈，没想到挨了一顿批评，没敢多说什么，赶快回来了。

区党委机关的运动情况相对好一些，但也成立了“主席团”，有些过去一直对组织不满的人趁机起哄，搅得机关一个多月不能正常工作。我们几个负责同志每天都要到会听取批评意见，有的人就故意刁难。听意见作记录不行，他说你不认真听，但不作记录也不行，他说你不想记住批评，以后无法改正。我要去参加群运工作会议，也要“主席团”批准，否则不能离开批评会场。

这种无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固然可以得到不少好的批评意见，但也给一些人发泄个人不满创造了条件，失去了开展正常批评的意义，干扰了抗日斗争的大方向，因此，这次审干的效果并不好。

罗荣桓同志及时发现了整风审干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和做法，很快予以制止。他在滨海地区也搞了试点，总结了经验。就山东整个民主检查运动来说，罗荣桓同志把握得很稳，不搞什么“抢救运动”，没有发生大的偏差，使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不然的话，在强大敌人面前，自己先“窝里乱”，岂不是帮了敌人的大忙？可是，就有些人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全然不顾党的事业和全局利益，“主席团”解散后，恢复了正常领导，有的成员说：“只痛快了半截。”幸亏他们只痛快了半截，否则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干什么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把党的利益和全局利益抛在一边，失去党的领导，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混乱，就要走向事物的反面。

在区党委机关召开的民主检查座谈会上，我对前段的民主检查作了总结，指出了存在的偏差，提出了今后应深入开展反省与自我批评问题。在总结时，我讲了一段话，附录于下：

在民主检查中，有的同志片面地理解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认为党内存有一套系统的官僚主义，把领导与被领导对立起来，对领导进行污辱、漫骂，甚至把用来对敌人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对待自己的同志，这是完全错误的，其结果不是改善了领导而是破坏了领导；不是治病救人而是置人于死地；不是严密了党的组织而是涣散了党的组织。还有些同志认为极端民主总比官僚主义好，因此就向极端民主发展，不要组织，不要纪律，完全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对上级要求极端民主，对下级则要求极端集中；对别人要求自我批评，而自己毫无自我批评精神。这就使党的组织失去原则规范。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就会削弱党的领导，使党组织毫无战斗力，甚至走向瓦解；只要集中而不要民主，就会形成少数人包办命令，而广大同志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因此，民主和集中是不可分割的，必须适当结合。领导与被领导都应党的利益为前提，都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领导与被领导的相结合，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更大作用。

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省与自我批评问题，我主要讲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认识到开展自我批评的重要性。自我批评是我们进步的武器，只有认真地开展自我批评，才能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团结上的问题。认识某同志的进步程度如何，可以从他自我批评好坏的尺度去衡量。第二，必须认识自我批评是光荣而不是耻辱，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这是个立场问题。因此，自我批评的好坏，又是自己阶级觉悟程度的反映。第三，要认识到自我批评是不断的。我们革命的过程必须是自我批评的过程，否则就会自满。也要注意不要把自我批评庸俗化，通过自己对党和对自己的高度责任心来进行，不扩大，也不缩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我批评的目的，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所以，开展自我批评，是促使我们不断进步的方式方法，是改善领导、转变作风的中心环节。



这次座谈会，同志们都能开诚布公地谈各自的见解和看法，对民主检查的深入开展和整风学习运动，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实践证明，人的思想作风的改造是很重要的同样一个人，在思想改造发展中，常常会有不同的表现。掌握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就必然会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并在自己的工作中体现出来。大家的水平提高了，党的各项工作必然做得更好。因此，提高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对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是至关重要的。这次整风学习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整顿了队伍，纯洁了组织，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高克亭（1911—1998），陕西省府谷县人。抗日战争期间历任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鲁东南特委（不久改称山东第一区党委五地委）书记，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区党委副书记。

海军陆战队激战穆陵关纪事

石绍庆

穆陵关，位于沂水县马站镇与临朐县大关镇交界处，左右有长城、书案二岭，是沂山东麓古齐长城的隘口。关下山谷峻狭，地势险要，曾为战国时期齐鲁两国相争的战略要点，号称“齐南天险”。自古以来，穆陵关战事频繁，刀枪剑戈，硝烟弥漫。1938年2月，退守穆陵关附近的沈鸿烈海军陆战队一部与由胶济铁路南犯临沂的日军第五师团片野支队激战五昼夜，以沉重的伤亡代价，成功迟滞了日军南下，为中国军队部署临沂阻击战及台儿庄战役赢得了宝贵时间。

一、穆陵关前枕戈待旦

1937年12月，华北日军进入山东。12月2日，日舰集结崂山湾，青岛局势紧张。18日，日军参谋本部在决心攻占济南的同时，命令华北方面军发动青岛作战。为防止日本海军从青岛登陆，沈鸿烈和第三舰队司令谢哲刚议定，于12日将“同安”“永翔”“镇海”“定海”等舰艇上的装备卸下，连同征用的一条商船沉于青岛港和刘公岛航道，并毁除航标，布设水雷。同一天，日军总攻山东，中国守军奉命炸毁青岛日本商人投资达3亿元的纱厂。



26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封锁青岛，日舰随之逼近。2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海军第三舰队和陆战队一起撤离，开往徐州。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第一、第二大队撤往山东内地，布防于临朐、沂水、莒县等山区，后属庞炳勋的第三军团指挥，陆战队司令为张赫炎。

在日军实施占领青岛行动的同时，其华北方面军积极谋划打通华北、华中战略，从而进行徐州作战以及对武汉施加压力，进而占领全中国。1938年2月3日，日军大本营电令华北方面军“对第五师团，为在必要时能迅速从海路转用于其他方面，故其位置应在胶济沿线”。2月中旬，第五师团完成对胶济沿线的警备部署。2月17日，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命令第五师团“以一支队配合向沂州方向前进的第一师团作战”。第五师团立即派遣片野支队向临沂方向挺进。片野支队，即为日军步兵第二十一联队，联队长为片野定见大佐，当时片野支队指挥的主力部队共有步兵一个半大队、山炮兵一个中队。2月17日夜，为向沂水及莒县方向前进，片野支队下达作战命令：竹内部队主力前往莒县，冈崎部队主力（携机关枪一小队，汽车二队，无线电一队）前往沂水，余部全队18日一早出发，迅速攻入目的地附近以掩护联队主力部队前进。

为确保徐州要地，国民政府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命令，于2月3日下达作战命令，将第五战区划分为四个游击战区，其中以庞炳勋第三军团及海军陆战队为基干组成第二游击区，布防于鲁南山区，向津浦、胶济、陇海及鲁东南海岸之敌游击。2月6日，第五战区命令第三军团在临沂附近配合地方部队，以一部夺取蒙阴、泗水后，向泰安、大汶口间及南驿、曲阜间之敌威胁；对日照、莒县、沂水北方要点，派一部与海军陆战队联合扼守。庞炳勋当即派一一五旅朱家麟部二三〇一团进驻沂水布防，与驻扎在穆陵关附近的海军陆战队第五大队等部联防。

二、穆陵关上鏖兵挫敌

海军陆战队第五大队系由青岛市清洁队、码头工人及青岛学生等500人刚刚组建而成。大队长为陈宝骥，辽宁抚顺人，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步兵科。第五大队虽在仓促中组建，但装备精良，有迫击炮3台、37mm速射炮1台、还配备捷克轻机枪。进驻穆陵关后，第五大队立即进行整训，呈马蹄形防御工事，其阵地范围正面约有3公里，侧面阵地也有1公里半，使该陆战队的战斗力在短时期内得到了提高。

进攻沂水方向的冈崎部队即为片野支队第四中队，中队长为冈崎大尉，中队辖3个小队共185人，同时配属机关枪小队22人、汽车队5人、旅团无线上等兵5人、翻译密探3人。冈崎部队曾于1938年1月30日在侵占淄川时制造了河东惨案，惨杀无辜群众达276人，焚烧房屋2000余间，造成42家绝户。

2月19日，冈崎中队派出第二小队（小队长为河岛少尉）作为先遣部队从蒋峪镇（属临朐县）向穆陵关前进。行进到穆陵关北约4公里处的李户庄村（属临朐县大山镇）时，与据守该高地的陆战队展开激战。冈崎中队当即下达作战部署：

（1）第一小队（大前小队）为右路，从西面山脊攻打敌人右翼，向紫山方向前进。

（2）第二小队（河岛小队，缺第三分队）为左路，从道路东侧攻打穆陵关东侧高地向前方推进。

（3）第三小队（片冈小队，缺第三分队）为中路，沿道路西侧攻打穆陵关东侧，向前推进。



(4) 机关枪小队及迫击炮分队由冈崎亲自指挥，在道路附近展开射击，片冈和河岛小队各自的第三分队作为预备队，伊藤分队被布置在后方地隙以掩护车辆马匹。

日军完成进攻准备后，在迫击炮炮火支援下，一齐向陆战队阵地发动了攻击。海军陆战队队员发现日军进攻后，凭借着险峻的山势，立即从正面及两侧高地向来犯日军猛烈地射击，成功将敌人限制在山下。第一次攻击失败后，冈崎再次命令各小队有机枪及迫击炮掩护下，向海军陆战队阵地发起了猛烈地进攻，进攻的日军再次遭受到陆战队密集的火力阻击。在正面攻击受挫后，日军专项从侧面攻击，冈崎亲自率领预备队向穆陵关西侧攻击，并命令大前、片冈小队发起猛烈攻击。面对日军第三次疯狂来犯，海军陆战队队员也不甘示弱，对来犯日军给予了迎头痛击，使日军寸步难行。

据黄埔军校毕业生、原海军陆战队老兵刘宗均后来回忆：

战斗持续到第5天，敌机十余架次轮番轰炸阵地，陈宝骥大队长命令全体官兵：“敌人不到百米以内，不准开枪！”待敌进至阵地前沿时，陈大队长一声“打”，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打得敌人倒的倒，逃的逃。陈大队长振臂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并领唱《义勇军进行曲》，山鸣谷应，声彻云霄，我军士气异常高昂。

2月19日傍晚，日军再次发动攻击，首先用排炮轰击陆战队阵地，然后由步兵从三面向穆陵关夹击，陆战队队员奋力抵抗，虽数次发起反冲锋，但终因弹尽援绝，陈宝骥大队长阵亡，部队伤亡惨重。全大队只剩下百余人，众寡悬殊，不得不撤离穆陵关一线，退至沂水县城休整。日军于当晚8时完全占领穆陵关，并完成部队集结，将战死者遗体葬于穆陵关西侧高地，仅取其右手火化作为遗骨。

在海军陆战队与日军激战的同时，沂水七区以李钟盈为队长、李道德为指导员的游击中队闻讯亦赶往穆陵关，从侧翼打击敌人。因日军火力太强，游击中队所处地形也不好，遂马上撤出。

海军陆战队以沉重的代价，完成了穆陵关迟滞敌人南进的任务，为临沂阻击战及台儿庄会战赢得了进行部署的时间。2月21日，沂水县城陷落，陆战队撤至临沂市高里镇茶芽山（今属兰山区李官镇）一带整训。

三、抗日战场屡立战功

在海军陆战队血战穆陵关的同时，由青岛撤出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大队朱新三部

辗转至莒县，驻扎在莒县城北40里处的招贤镇附近。2月中旬，盘踞在安丘城的日军片野部队第一大队在大队长竹之内嘉太郎率领下，以刘桂堂皇协前进军骑兵为前导，沿莒安路南侵，于2月17日黄昏进驻招贤镇，直逼莒县。为阻止日军南犯莒县，海军陆战队出动一个中队，与莒县县长许树声派出的保安队一同在茶沟南部设下伏击防线。18日凌晨，日军闯入伏击防线，伏击在茶沟附近的海军陆战队轻重机枪、迫击炮齐发，敌军仓惶北退。因许树声部枪支落后、战斗力薄弱，不得已而南退，导致海军陆战队孤军追击，损失较大。

18日晚，从诸城南侵之日军，在夜10点左右窜至柳家庄，妄图夜袭招贤、南逼莒城。海军陆战队300多名官兵部署在围墙的北、西两面，向进攻之敌猛烈开火，激战四五小时，天已拂晓，日军狼狈北退，溃至莒北管帅一带。20日，日军又调动大批汽车、重炮，从石家官庄高地气势汹汹地挥师南下，至瓦屋、柳家庄之间，又遭海军陆战队阻击，汽车被击毁多辆，敌军伤亡近百。日军受挫后，兵分两路，一路仍顺公路拼命前进，另一路沿河东向镇东北角包围。此时，据守在招贤镇东、南两面的地方游击队怯战撤退，给敌可乘之机，使我海军陆战队腹背受敌，伤亡百余人，撤退至三户庄，招贤陷落。招贤一役，日军第五师团片野支队第一大队长竹之内嘉太郎少佐毙命，伤亡近百人。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2月22日密电蒋介石、何应钦时指出“招贤失陷后，陆战队损失奇重，退在夏庄整顿”。

蒋介石在1938年3月12日致电李宗仁：沈鸿烈部陆战队，勿使用于正面作战，应以破坏胶济铁路，扫荡胶东伪组织为主要任务。此时，临沂阻击战刚刚打响，第五战区遂命海军陆战队归张自忠第五十九军38师指挥，编为左侧支队，向葛沟方面侧击，以牵制敌人南下，海军陆战队在葛沟协同第40军补充团予敌以沉重打击。

临沂阻击战结束后，陆战队司令张赫然去职，改由杨焕彩接任，海军陆战队转移到沂蒙山区整训，其中一部转战到鲁北地区。1938年冬，沈鸿烈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机关驻地由鲁北转移到沂水境内的东里店（今属沂源县），海军陆战队大部也跟随而来，经过休整，再次转战于敌后战场，屡建战功，一直坚持到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

参考资料：

1.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第32辑（民国海军专辑）》。
2. 蒋纬国编著：《抗日御辱》第五卷。
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宋绍柏校：《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上册）》。
4. 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史编撰委员会：《滨田联队史》。
5. 沂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沂水文史资料第10辑》。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2编军事2》。
8. 日照市情网。

铁军大帐追歌行 (四)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麻村今貌

太平县麻村 ——打响第一枪

(1938年5月7日——25日)

麻村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安徽省原太平县境内。太平县始建于唐天宝11年（公元752年），时属宣城郡，县址在仙源镇，麻村就在仙源镇的东南端。村子背靠一溜绵延数百米、海拔500米左右的青山。山势高低参差，状如马鞍，故名马鞍山。山上草木葳蕤，似一道青翠的屏风呵护着村庄。村庄前面地势开阔，田畴广袤，一条大道贯穿于前，再一条麻川河潺潺流过，风景十分优美。麻村历史悠久，原有五马坊等多座牌坊，还有明善庵、开福寺、文峰塔等等，由于近现代史上战火不断，损失惨重，荡然无存。



麻村军部原址



麻村兵站纪念亭

来到麻村，却不见有新四军军部旧址的标志。我们在路旁一处饭店就餐时，问及年轻的店老板是否知道新四军军部的旧址在村里何处。一听新四军，他显得十分热情，说自己虽然不很清楚，但他的父亲听上一辈老人常常谈及新四军的事情。不等我们请求，他主动接通了父亲的电话。老人更热情，不大会儿便骑着电动摩托车风驰电掣地来到了店中。看老人驾驶摩托车的酷模样儿，不亚于青年人。老人名叫李银根，已经77岁，但身体硬朗，记忆清晰，十分健谈。他说新四军军部到达村里后，住在村前麻川河畔的胡家大祠堂内。祠堂本来保留尚算完好，但建国后，由于在麻川河上修建蓄水大坝，河水水位涨高，淹到了祠堂墙根。本来经年失修的祠堂地基下沉，墙体裂缝，村里为防止发生倒塌，干脆拆除了祠堂。后来有村民不怕水泡，又在此地建了临时住房。故而，新四军军部在麻村的旧址没有保留下来。

军部在此小住半月余，便转移去了南陵县土塘村。就在那年的6月，新四军军部又在麻村设了“新四军兵站第二派出所”，即“麻村兵站”。说完，老人热情地为我们当向导，骑上摩托车，在前面威风凛凛地为我们“开道”，先来到村口仙源大桥西头的“兵站纪念亭”前瞻望了一番，接着带领我们找到了胡家祠堂的旧址，总算让我们没白跑一趟。临走时，我紧紧握着老人的双手，连声道谢。他一个劲地说，不用谢不用客气，应当的应当的。

因为开发黄山旅游区、建设太平湖的需要，198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太平县建置，设立县级黄山市，地址搬迁到甘棠镇，直属安徽省。1987年11月27日，又撤销县级黄山市，改为黄山区，隶属地级黄山市。

一、 蒋家河口巧设伏，首战告捷灭强虏

就在新四军军部与第一、二支队誓师北上、挺进敌后的同时，集结在皖西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也奉中共中央之命，挥师东进抗日。战士们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于1938年四五月间抵达无为、巢县等地，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争。

此时，日军大举进攻皖中，合肥、巢县、淮南、阜阳、滁县等地相继沦陷。日军控制了淮南铁路线，大肆掠夺矿产资源。当时驻守皖中的国民党部队二十一集团军，弥漫着恐日情绪，根本不敢与日军正面较量。而新四军四支队抵达皖中后，目睹了日军对皖中的侵略和对百姓的蹂躏，更加义愤填膺，决心给野蛮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以狠狠打击。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决定，派第九团进入巢县的银屏山区，寻机打击日寇。该团指战员大多是经过3年游击战争锻炼的老红军，虽然装备差，但政治坚定，作风顽强。而银屏山方圆百里，山岭险峻，有险可守，是隐蔽和出击的好

地方。

第九团到达银屏山后，副团长高志荣亲自出马，带领小分队四处侦察，走访群众，打探敌情，积极备战。他们化装到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3天，从当地百姓那儿获悉，自巢县沦陷后，驻在此地的日军坂井支队，经常下乡抢掠；由于无人抵抗，鬼子肆无忌惮。蒋家河口一带，就是日军经常袭扰的地方。此处位于巢湖市区东南郊大约5公里左右，并非村庄名，而是蒋家河与裕溪河交汇处的河汊口，河口左右两则分别为兴墩村和双喜村。通过反复侦察，我军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日寇每天上午八九点钟都要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从巢县出发，乘一两艘汽艇或木船，人数为10—30人不等，抢掠后于午饭前返回。由于从未遇到过抵抗，其戒备十分松懈。

掌握情况后，高志荣决定在此设伏，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让侵略者尝尝新四军的铁拳，团部遂拟定了详细的歼敌计划。

5月11日下午，第九团抽调团侦察队和二营第四连、第六连一排，在银屏山集结后，由二营营长黄仁廷、侦察参谋郭思进率领，直插蒋家河口，于傍晚时分秘密潜入伏击地点。团侦察队隐蔽在河口两岸的堤埂下面，从正面迎敌；四连二排隐蔽在侦察队后面的小村庄里作为预备队；四连一排、三排潜伏在河口北边小高地下面，随时准备阻击增援之敌。

指战员们等待了一夜，第二天上午8时左右，巢县方向的河面隐约传来汽艇的嘟嘟声，大家顿时瞪大了眼睛。这时天气晴朗，河面上没有来往的船只，岸上也不见行人，只见鬼子的汽艇渐渐驶近，大家已能清楚地看到鬼子们钢盔和刺刀反射的贼光。

片刻时间，汽艇靠岸了。毫无防备的鬼子一个个倒背着枪，哼哼呀呀地唱着日本小调，慢吞吞地从汽艇上跳下来，大摇大摆地上了岸。看到日本鬼子的模样，设伏的新四军个个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步枪手枪一齐向鬼子射出仇恨的子弹，手榴弹也在鬼子中间轰轰地炸开了花。鬼子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纷纷转身而退，企图抢占汽艇，但汽艇已被我们的手榴弹炸了个底朝天。日寇被困水中，被动挨打，非死即伤，尸横河面。战斗进行得干净利落，仅20分钟就歼敌25名，缴获步枪9支、手枪2支、敌军旗一面，而新四军则无一人伤亡。



蒋家河口

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组建后在抗日战场上打的第一仗。首战告捷，军威大振。5月15日，《新华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项英称，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开始第一次胜利的战斗”，规模虽然不大，却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连蒋介石也致电叶挺、项英，表示嘉奖：“叶、项军长吾兄：隐电悉。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中正铣日。”

蒋家河口战斗意义重大。

首先，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和热情，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展。战斗胜利的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群众听到消息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许多爱国人士、爱国华侨都纷纷向新四军发来贺电、贺信。一些爱国青年在胜利消息鼓舞下，纷纷奔赴皖南各支队，报名参加新四军，四支队当时的司令部驻地舒城也成了爱国青年聚集地。据统计，1938—1939年，仅各地办事处转为介绍参加新四军的爱国青年就有3万多人，军部与各支队都组建了教导团（队），培养和训练了大批抗日游击队战士。与此同时，许多自发分散的地方抗日武装，也纷纷加入新四军行列，1938年8月，四支队收编各地游击队成立了抗日游击纵队，共有1500多人。

其次，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蒋家河口遭到新四军突袭后，被迫迅速调兵来援，从进攻合肥的部队中调回了一个大队来加强巢县城的防守。由于害怕再次遭受新四军的袭击，日军虽然兵力增强了，但多数时间只能龟缩在巢县城内，戒备森严，不敢随意到蒋家河口及巢县县城周边“扫荡”抢劫。四支队的各部也先后在合安、合六两条公路上，组织了多次伏击战，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牵制了日军向西进军，有力地支援了武汉保卫战。游击战、伏击战已成为新四军在敌后克敌致胜的法宝，新四军也成为敌后抗日的一支坚强生力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支持。

第三，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也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攻击新四军是“山大王”“游而不击”的谬论。参加蒋家河口战斗的四支队九团，原为红军鄂东北独立团和红二十八军，他们曾经历过5次反“围剿”和3年游击战争的磨炼，是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都是忠于人民忠于党、身经百战、英勇顽强的老红军骨干。这次在战斗中初次与日军交战，又一次展现了红军英勇顽强、敢打敢胜的本色，也证明狂妄至极、不可一世的日军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勇于战斗、善于战斗，就一定能战胜它。在日本侵略军面前，国民党许多部队闻风丧胆、不战自退；有的不打民族的共同敌人，却专事内耗摩擦，还贼喊捉贼，对新四军造谣污蔑。蒋家河口一战，刚刚成立的新四军就敢于向日寇挑战，使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谣言不攻自破，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新四军不畏强敌、坚决抗战的立场与决心，树立了新四军的政治、军事威望，树立了共产党的社会威信，跟着共产党、新四军与八路军，成为众望所归，民心所依。

二、中共中央再发令，敦促项英速行动

在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上，项英的犹豫不决让中央仍然感到不放心，生怕他进而又止，半途而废。新四军军部进驻太平县麻村后，5月14日，就在安徽合肥市沦陷的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长江局、东南分局及项英，对在江南敌后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再次作出指示。电报指出：

甲、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亦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立。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地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乙、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地去发展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丙、必须向党的干部解释目前斗争形势与过去的根本区别。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法与方式应与过去的根本不同。要他们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打击造谣中伤与打破防范限制。

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实际上重申了毛泽东的《五四指示》精神，在某些重要方面，又作了特别具体的解释与说明，以期使项英真正深刻地明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坚持的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把思想与行动迅速、真正地转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上。其要点，一是必须认识当前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斗争形势已经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同，国民党、蒋介石尽管从心底不愿意看到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其顽固派尽管不断地制造摩擦与破坏，但是，国民党政府也不敢轻易冒天下之大违，甘愿背上卖国骂名，公然破坏统一战线。而且，国民党政府机构与军队，大都离开了敌后，在这里，国民党统治与管辖基本成了“真空”，“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地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天时地利，正是我党我军在积极的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大好时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怎么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呢？错失良机，贻误发展，必将酿成历史之过。二是无论何时何处的游击战争，都必须坚持我党我军的胜利之本——依靠人民群众，以自己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地去发展与组织群众。只要有人民群众做铜墙铁壁，做我们的坚强堡垒与后盾，在中国的大地上，无论在山区还是在平原，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水上，都能进行游击战争，而离开了人民群众，无论在哪里都难以为继。项英总结的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两条经验一靠“山”二靠“边”固然没错，但都强调了自然因素，而社会因素、最重要的人的因素呢？即便是3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游击队被国民党视为非法、看成是“匪”，还能坚持在“山”上“边”上，没有群众的暗地支持与帮助，你能生存下来？在今天共产党及军队合法化，广大人民群众可以光明正大地拥护支持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形势下，难道环境反而比过去更危险更不安全了吗？所以，中央书记处电报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同时发给长江局，实际上也是对长江局的王明必须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暗示和提醒。王明从苏联回国后，认识与处理问题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调头，从在党内路线上的极“左”一下转到对党的统一战线、党对国民党政策方针的极右，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这分明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统一到国民党、蒋介石所谓的“军令政令统一”上去，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取得抗战的速胜。他的这种右倾错误受到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批判。但是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和他的振振有辞，其错误路线当时也确实对党内不少领导同志造成了一定误导与影响。王明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后，直接领导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工作，继续坚持其错误主张。作为下级，项英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使他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一方面是疑窦不断，害怕“中计”，另一方面又放不开手脚，自己束缚自己。对此，毛泽东在“五四指示”中就告诉项英，对国民党不要事事请示与报告。在合作抗日的前提下，新四军要在敌后游击战中消耗日军、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但在政治上、组织上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事事都听国民党的摆布，可以根据情况，独立自主地行动。只有这样，新四军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党中央与毛泽东所以反复地督促项英迅速地带领新四军挺进敌后，是因为每天都在盯着迅速发展的战争形势。日寇咄咄逼人，步步推进，像毒蛇一样吞噬着中华大地，从华北



蒋家河口“第一枪”参战人员合影

华东逼进华中，深入我中华腹地。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正面战场尤其是在徐州进行了顽强抵抗，但仍然避免不了节节败退的结局。而日军的战线越长，对后方支持的需求越大，而后方只能越来越空虚，只手难覆，鞭长莫及，给我们进行敌后游击战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余地。如果这时新四军像一把闪电般出鞘的利剑，猛然插入日军的背后，不但能对其形成有力牵制，还能直接打击、消耗、消灭其有生力量，发展壮大我军及群众力量，形成敌后根据地。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果然，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几天后的5月19日，徐州沦陷。

具有战略目光的叶挺，更多的是考虑新四军的发展，特别是东南部队向苏南挺进后，江北第四支队的行动方向。就在徐州失守后的第3天，即5月21日，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自己的建议：徐州已失，敌后空虚。第四支队应向皖东敌后发展，建立新的战略支点，这样对江北部队发展更有利。

叶挺的建议与中央想法又一次不谋而合。5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发出了《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又一次提出了大力发展鄂、豫、皖、苏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

5月25日，新四军军部接到上级“不准久住太平”的命令，向南陵县土塘村转移。

从绿林好汉到八路军传奇司令 (上)

——记刘海涛

王卫东 王欣

刘海涛，1907年生，山东东阿县人，原名刘宝仁。高小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故在家务农。1927年去关东闯天下，最后落脚在珠河县（今尚志市）谋生。

刘海涛是个性格倔强且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翌年夏的一个傍晚，他路过珠河县警察署门前时，碰到两个警察在欺辱一个姑娘，便上前劝阻，警察骂他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伸手煽了他两个大耳光子。刘海涛强压怒火，继续劝说警察把姑娘放了，结果又被警察狠狠地打了两枪托子。刘海涛忍无可忍，出手反击（他在家乡学过武术，会点武功），连击数拳把两个警察打倒在地，掩护姑娘逃走。他执意站在原地不走，准备再和警察理论一番，哪知从警察署跑出一群警察把他团团围住，被扭送到警察署，关进了监狱。刘海涛的几个朋友凑了些钱托人把他保释出狱，但他已被打得遍体鳞伤。警察的暴行把他逼上了梁山，他的伤还未痊愈，就秘密地串联了二十多个弟兄，在一天深夜，手持长矛、大刀、菜刀、斧头袭击了珠河县警察署，夺取了步枪十多支，连夜进了山里，走向了劫富济贫的绿林道路。他带领这支队伍，专打恶霸地主和贪官污吏，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刘海涛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绿林好汉。

追随赵尚志抗日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海涛毅然率部加入了义勇军孙朝阳部参加抗战，曾在帽儿山、阿城和哈埠外围与日军多次激战。在这频繁的战斗中，他结识了打入孙朝阳部做兵运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启东，在他的教育帮助下，刘海涛于1933年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赵尚志和李启东等人离开孙朝阳部之后的12月初，刘海涛率14名战士携枪脱离孙朝阳部，直奔珠河参加了赵尚志领导的珠河东北反日游

击队。从此，踏上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

1934年6月29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成立，刘海涛任骑兵队指导员。在赵尚志的率领下转战珠河、宾县，参加了攻打宾州、血战三岔河和攻袭五常堡等著名战斗。因作战英勇顽强，很快晋升为哈东支队第七大队大队长、第九大队指导员等职。

为了粉碎日寇的冬季“大讨伐”，刘海涛随赵尚志率部北上延寿、方正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1月下旬，赵尚志和省委巡视员冯仲云率哈东支队一、九大队、三大队一部及司令部少年连骑兵共100余人，由方正西的宾县返回珠河道北地区活动，途中与日军军展开了数次激战，最为惨烈地当属肖田地突围战。

11月25日下午，赵尚志率部在方正县与宾县毗邻地带肖田地准备宿营时，遭到尾随的日军望月部300余鬼子兵和日军邓文章部400余人围攻。赵尚志指挥部队迅速抢占了制高点与敌军展开了一场浴血战斗，我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同仇敌忾，勇敢杀敌，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激战中司令部秘书长陈庆山、政治部青年科长宋阶平等同志牺牲，赵尚志的左肘部中弹负伤，血流不止，不能指挥作战，他命令刘海涛负责指挥部队突围，随后被战士扶下火线，此时天色已晚，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

刘海涛临危受命，面对强敌，毫无畏惧，沉着冷静，他决定在敌人尚未对我军形成全部包围前，立即从敌人合围的空隙地带跳出去，否则，一旦敌人形成合围，发起总攻，我军有覆没的危险。同时，他也预计到鬼子在外围必设伏堵击。刘海涛有多年的绿林生涯，对这一带的山间小路很熟，因此，他率部趁着夜幕的掩护，绕开日军军设下的层层堵击、伏击（事后证明果然如此），从敌人绝对意想不到的山川荒野中跳了出去。随后部队在赵尚志、刘海涛的带领下，经过二三百里路的急行军，安全到达珠河北游击区。

肖田地之战，我军毙伤日伪军六七十人。日军对我军英勇善战十分惊奇，称“这是德国式联军的退却”，此中“必有名将指挥”。



东北抗日联军
在行进中

llirongshan2008.blog.163.com

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

肖田地之战凸显了刘海涛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军事指挥才能。1935年1月2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正式成立，刘海涛任一团团长，张寿籛（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团是三军一师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团。3月9日，赵尚志指挥第三军一团与友军谢文东部、李华堂部，采用突然袭击战术，攻克了方正县城。正当刘海涛率一团攻击伪县公署时，敌援兵赶到，友军在没有告知第三军的情况下，从城内撤出战斗，致使第三军一团在城内孤军战斗。我一团战士在团长刘海涛的带领下，群英群胆，猛打猛冲，终于杀出敌围。

尔后，一团留在延寿、方正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9月初，刘海涛、张寿籛率一团和李华堂率部到方正县大罗勒密的三家子屯与四军军长李延禄会面。三支部队在一起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李延禄、刘海涛、李华堂商量决定：三支部队打一个胜仗庆祝会师。9月7日，三支部队突然袭击松花江岸的洼洪镇，全歼守敌伪军关团一个排和洼洪大排队，缴枪30余支，拔掉了敌人这个据点后，大罗勒密以东和以南，牡丹江西岸成了抗日部队的根据地。

战后，刘海涛等人在大罗勒密四军军部，看到了从吉东特委转来的《八一宣言》，深受鼓舞，各部队领导决定再打一个胜仗，庆祝《八一宣言》发表，于是决定攻下刁翎镇。根据刁翎区委书记孟泾清提供的刁翎镇敌人兵力部署情况，制定了周密地作战计划。9月16日上午，第三军一团、第四军二团、独立二旅、李华堂部、谢文东部，按分工向刁翎镇发起攻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攻克了刁翎镇，伪警察大队被击溃逃窜，伪警备队段营长率全队反正，尔后参加了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此次战斗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物资，摧毁了敌人的各种工事。然后，李延禄、刘海涛根据内部的密报，趁林口敌人空虚之际，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以每日急行军120里山路的速度，于29日凌晨3点对林口镇之敌发起了攻击，守敌弃城逃跑，此次战斗我军缴获战马300余匹。10月初，第三军一刚刚回到大罗勒密山区，当地一位知情群众给刘海涛送来一份情报说：从依兰起航的两艘满载伪军冬衣的帆船向三道通驶来。进入10月份的北满山区，天气已经很凉了，但战士们还穿着破旧的单衣。刘海涛和张寿籛决定打伏击夺棉衣。10月7日，他们将部队带到敌人船只通过的地点周围，侦查好地形埋伏起来。晚上十点钟左右，两艘满载冬装的帆船顶着急流驶进了我军的埋伏圈，顿时枪声大作，押送服装的伪军来不及抵抗就被歼灭了。此战缴获冬装300多套、现款500元、步枪20支、子弹800余发、白面30袋。这次战斗不仅解决了冬装问题，而且扩大了我军的影响。

刘海涛在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斗争中屡建功勋。1935年10月，晋升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师长，翌年二月任抗联三军一师师长（因去苏联未到任）。三军司令部为了坚持下江地区持久的抗日战争，决定在汤旺河沟里建立医院、被服厂、电台等后方根据地，为实现这一计划，赵尚志特派刘海涛去苏联商谈援助并向中共代表团汇报工作。

1936年2月的一天黑夜，刘海涛从黑龙江萝北县境的冰面上，一步步爬到苏联境内后，被苏边防军扣留。刘海涛向苏方出示了抗联三军司令部签发的介绍信后，苏方经三天审查、核实，确认刘海涛系抗联干部后将其放行。刘海涛辗转来到了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了来苏的任务。又撰写了《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呈送代表团。中共代表团为了培养这位抗联青年英才，将其送往著名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步兵学校学习。

国学大师王献唐

威海莹



王献唐（1896—1960），初名家驹，后改名瑄，字献唐，号凤笙、向湖老人，室名双行精舍，以字行。日照县城关韩家村（今日照市东港区大韩家村）人，先祖为江苏东海人，明初迁山东莒县，后迁日照。祖父王宏基，清庠生。父王廷霖为当地著名中医，酷嗜金石，师承清代著名金石小学家许瀚（印林）先生，对小学研究造诣颇深，著有《泉币图释》《读说文日记》等。王献唐幼承家学，5岁即开始练习作画，10岁时已能背诵《唐诗三百首》。11岁入青岛礼贤书院求学。后来家庭无力支付学费，就白天上学，晚上去报社排字、校对，挣钱维持学业。文科结业后，插修德文班，直至毕业。1914年，入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习土木工程。后因家境日渐贫困而未能毕业。

1917年，王献唐应《正义报》之约，赴天津翻译德文小说。1918年，回济南任《商务日报》和《山东日报》主编。1920年，任山东专门政法学校国文教员，兼任《上海新报》和《申报》记者。

1922年，青岛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他作为接收青岛的代表，任胶澳督办公署秘书。1923年，任青岛财政局股长。1924年，与青岛礼贤书院院长苏保志（德国人）等发起成立“中德学社”，研究文字、哲学，翻译中德两国文艺、哲学作品，促进中德文化学术的交流。是年夏，著《公孙龙子悬解》一书，对历代为《公孙龙子》作注之各家“一一为之疏解，其是者因之，非者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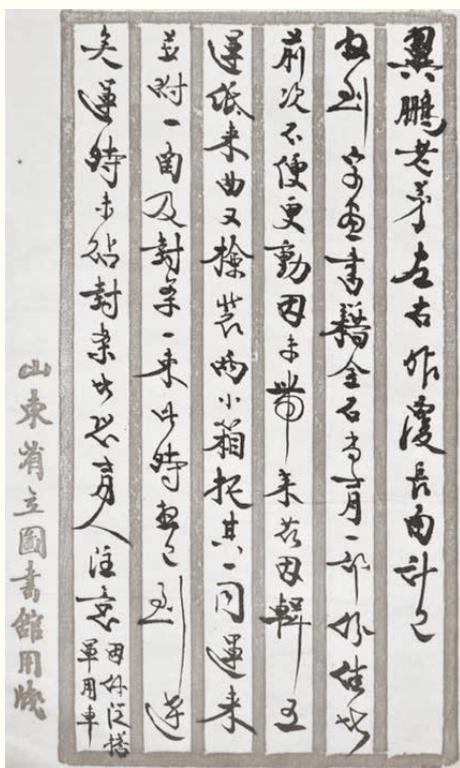
1925年赴北京，任京汉铁路局文书科办事员。开始研究目录学，并与丁惟汾

等共同研究音韵、古文字，并常典衣缩食，购买图书碑帖，写成《两周古音表》和《幽宵古韵考》。1926年，国民革命军攻克江西。年底，应丁惟汾之召赴南昌，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通讯社一等秘书及中央训练部总务科长。1927年4月，由丁惟汾介绍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不久，因报纸泄密之事被怀疑，愤而辞职，发誓从此不问政事，潜心研究学问，并改名王献堂。

1929年8月2日，王献唐应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之邀，出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当时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因经过“五三惨案”，院内弹痕累累，到处是坑。

“一时纷乱凄怆，不可名状”。王献唐一到任即厘定馆章，变更组织，把全馆分为编藏、阅览、事务三部，各负其责。他亲自制定修缮计划，申请经费，将馆内各处破坏房屋修缮一新。并带领全馆同仁一一清点馆存书籍字画古物，对全部散置各处之书籍，依册数卷，次第归部；同类书籍散置各室者，分别检齐，按类归架；剔除重复而版本相同者，另处存储，备日后出借；对损坏而版刻内容有保存价值者，依次修补，归类度藏。图书馆先前只有一处阅览室，读者阅览杂聚一处，甚为不便，遂将其增至四处：总理纪念室、普通图书阅览室、参考图书阅览室、儿童图书阅览室。为扩大读者对古文物的感性认识，又另设展室4处：古物美术展室即“博艺堂”，陈列善本书画、碑帖、铜器、玉器及其他文物；碑龕陈列室，陈列碑碣及造像等；汉画堂，陈列汉代画像、石刻等；罗泉楼（于右任榜书），陈列玉函山房藏古钱币及有关书籍。室内各物品皆分类编号，并加以文字说明。为方便读者阅览，除参考图书阅览室采用闭架式外，其余皆为开架，展室则任人参观。以前来馆人员每人收门票费铜圆4枚，并且规定星期二至星期五为男子游览，仅星期六对女子开放。王献唐到任后，取消门票，所有展室全部免费，男女可同日游览，星期天也照常开放。

经过近半年的紧张修葺、整顿，山东省立图书馆终于1930年1月1日以崭新的面貌向读者开放，“阅览人数，较之从前，几增加百倍”（《山东省立图书馆概况》，1933年8月）。为丰富馆藏，王献唐尽力争取经费，使之从1928年的1000元，增至1932年的29611元。他大量添购新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书籍，并走访僻巷冷肆，搜购图书和金石古物，若检得一善本，则倾其所有。如海源阁藏黄丕烈校《穆天子传》及顾千里校《说文系传》，即以其一个月的薪俸购得。山东聊城海源阁，以其富藏宋元刻本和名人手抄本被列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由于兵祸四起，到1927年，海源阁经三世收藏的古籍开始变卖散佚。1928年8月，土匪王金发进驻聊城，占据海源阁，大肆劫掠焚毁藏书，以宋元本书籍生火做饭或擦拭枪支，使海源阁珍藏遭到空前浩劫。王献唐对此大声疾呼，力图挽救。1929年11月，亲赴海源阁，将匪兵劫余检点一过，归后写成《聊城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海源阁藏书之损失及善后处理》两文，愤怒揭露军阀和土匪抢劫破坏“海源阁”的罪行，指责当局熟视无睹的态度，提出善后处置的具体办法，并以一介馆长的微薄之力，从济南敬古斋等处为图书馆收购了一部分海源阁藏书。1932年，海源阁劫后藏书由聊城运出，准备出售。为保管这批珍贵图书，他提出了三种收购办法，但在黑暗的旧中国无法实现。后由济南人士辛铸久、苗兰亭、张萧斋等的多方努力，方从北京购回，战后悉数捐入山东省图书馆。这批书共有2500余种3.2万余册，其中善本书共590种、9802册、32823卷。由于王献唐的苦心经营和多方努力，至“七七事变”前，山东省立图书馆藏书由其主馆前的62770册增至21.8万册；所藏善本书籍，如唐人写经、宋元旧槧、明清精刻及抄校稿本、合佛道藏（其中包括著名的《明南藏》6331卷）已达3.6万册；汉魏隋唐石刻、铜器等金石物品1.7万余件；益都李氏大云山房、曲阜孔氏微波榭、聊城杨氏海源阁、新城毛氏池北书库、德州田氏古观



1937年10月第二批馆藏珍品启运曲阜时，王献唐致屈万里之信函。

堂、历城马氏玉函山房、诸城刘氏嘉荫榭、日照许氏攀古小庐、潍县陈氏十钟山房、海丰吴氏双虞壶斋等处藏书遗存，均荟萃于省立图书馆，使山东省立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

1930年1月，“山东省名胜古迹古物保存委员会”成立，王献唐当选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联合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王献唐担任该会秘书，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共同领导、参与了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之后，还亲自考察滕县宏道院出土汉石（撰《滕县新出汉画石及其他》）和滕县春秋邾国旧址出土鼎、敦、盘、鬲等铜器（撰《春秋邾分三国考》），调查掖县等处寺观，搜集明刊佛、道藏1.4万余册。

1931年3月，王献唐创办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是山东省最早的图书馆学刊物，在全国也属前列。《季刊》分门别类刊载文章，计有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及新出书籍之评介、图书馆经营方法之研究等，每期约20万言。如第一期刊载：王献唐《如何能使中国图书排列一处》《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置》《一年来本馆工作之回顾》，董井《山东省立图书馆金石志初稿》，栾调甫《墨子之传本源流与篇什次第》，牟祥农辑著《列女传补注校录》《杨刻蔡中郎集校勘记》，李毓麟译《杜威图书分类法》，图像《汉琅琊相刘群墓表》《滕县新出土汉画石之一》等等。这些文稿反映了当时齐鲁文化研究的较高学术水平，为扩大山东省立图书馆在海内外的影响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后因抗日战争爆发，经费紧张而停刊。

1934年3月，在王献唐的极力倡议下，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力主其事，申请到经费5万元，在旧馆西邻毗连处建藏书楼。他自行勘察设计，亲自组织施工，夜以继日，不辞辛苦；事无巨细，躬亲斯役。藏书楼设计为“山”字形，占地二亩六分四厘，上为书库，下为阅览及展览诸室，于1935年1月竣工。定名为“奎虚书藏”。王献唐又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采取了科学的管理办法，使图书馆工作井然有序。加之地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大明湖畔，一时名人大家



王献唐绘画作品

接踵而至，文人墨客流连忘返。山东省立图书馆进入了自建馆以来最兴盛的时期。

抗战前，王献堂兼任齐鲁大学教授，主讲文字学和版本目录学。期间，他与国内著名学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黄炎培、刘半农、顾颉刚等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写下大量有价值的著述。如1934年，省立图书馆收得滕县出土三邾彝器，为世人瞩目。王献堂从考古、音韵、古文字、古地理以及古民俗学等各个角度，对一些纬书的记载和神话似的历史传说作了考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文化，虽属于炎黄二族，但主要属于炎族，即夷族文化；欲求远古夷族文化，其中心就在山东，并于1937年写成书稿《炎黄氏族文化考》。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逼近济南，王献唐唯恐馆藏善本图书与文物精品落于敌手或毁于兵灾，于是请示当局，将书迁出济南；但因政府官员逃散，无暇顾及此事，南徙文物的经费没有着落。王献唐便求亲告友，变卖自己的收藏，筹措经费。于1937年12月27日将馆藏宋元版善本书、唐人写经、商周铜器、秦汉瓦当、明清瓷器等装成十巨箱，舍妻别子，只身率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及工友李义贵二人，搭乘省立医院的重伤员专车，“过铜山，经汴郑，出武胜关，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袭，而抵汉口”。在汉口行将装船入川时，运费无着，适遇山东大学校长林济清。时山东大学拟迁校四川万县，正好也行至汉口。林济清仰慕王献唐的才学，聘其为中文系教授，并预付800银元酬金。王献唐考虑到书籍能与山大书籍一起运，比较安全，酬金又可作为保护书籍及屈、李二人之开销，便慨然应允，主讲文字学和版本目录学。1938年1月19日，王献唐一行自汉口起程，逆江而上，一路艰辛，终于1939年12月24日将图书文物存于四川乐山大佛寺天后宫。整个行程7000余里。抗战八年，王献唐流寓于岩洞佛寺，以馆长自任。1940年，他受聘担任国史馆总干事，兼任山东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在政府经费断绝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微薄收入，维持其保护图书费用的开支。在清贫困苦之中，衣食不继，而志守弥坚。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那罗延室”（梵语），以示其牢守齐鲁文物之义。在川中，常有敌机空袭警报，大家都避入防空洞，唯独王献唐始终守着这批文物书籍，有人劝其暂时躲避，他说：“这是山东文献的精华。若有不测，何以面对齐鲁父老，只有同归于尽了！”

抗战胜利后，王献唐谢绝了国史馆的一再聘请，于1948年返回山东继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国史馆纂修。1950年12月25日，保存于川中的图书文物完璧归里。

新中国建立后，王献唐历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等职。1960年11月，王献唐因病在济南逝世。

王献唐是国内近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文字学家、书画家，精于文字、音韵、金石、目录、版本，又通典籍，兼长诗文、书画和印章。著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山东古国考》《黄县翼器》《山左先哲遗书》等50余部，逾千万字。

左丘明与《左传》

王红霞



北宋《太平寰宇记》“沂州丞县”记载：“左丘明墓在县（今峰城）东北七十里，与郚州平阴墓（今肥城市衡鱼村）并列。”

《临沂县志·古迹》云：“向城东南十许里左家官庄，左墓在焉。今渐陀平。南百许步，石基铺墓道也。道、咸间隧陷，入者见石门，篆书左丘明墓云。”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宝贵的文化典籍，被钱穆先生称为“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准观点所在”。

一、左丘明其人

左丘明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论语》：“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从孔子的语气中不难体会出孔子将左丘明引为同道，对于花言巧语、伪善的作法都感到很可耻。由此得知，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而且与孔子关系甚笃。有人就此认定左丘明必早于孔子，“因为孔子这段语言把左丘明放在自己之前，而且引以自重”。其实，仅凭这一条就断定左丘明早于孔子显得证据不足。更多的史料说明左丘明为孔子同时代人。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四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与这段内容相近的记载见于《汉书·艺文志》：“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由上述史书记载可知，左丘明曾与孔子同观史书，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目的就是避免“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为了保孔子《春秋》真意。《左氏春秋》乃依孔子《春秋》而立传。对于孔子与左丘明同观史书之事，严彭祖《严氏春秋》引《孔子家语·观周》也有类似的话：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周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

之传，共为表里。

左丘明之所以能写出《左传》这样的煌煌巨著与他是一个史官有很大的关系。《论语》孔安国注称他为“鲁太史”。《汉书·艺文志》自注称其为“鲁太史”。新近发现的孔府档案的新资料《左传精舍志》称左丘明“世为鲁左史官”。左丘明的姓氏与他的职官是相联系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丘明为左史官，以官职为氏，当姓左。《左传精舍志》卷五《姓谱》更证明了左丘明姓左。

“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子封于营丘，嫡子丁公伋立为诸侯，其支子印遂以邱为姓……其以丘为姓者，印生商，商生畜，畜生亚，亚生采，采生娄嘉。嘉因杀胡公，恐后及难遂奔楚，世为楚左史官，生子均……（周景王）十有六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干溪。相之子（成）避国乱遂适鲁，为鲁太史。（成）生丘明，世为鲁左史官。姑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十五代孙名起者，工文学，王莽征召不就，恐及于祸，又去左袭丘，隐居陶阳，复以丘为姓氏。”

这段文字极为宝贵，叙述了丘姓的变迁过程。丘姓经历了“丘——左——丘”的演变，左丘明处在以左为氏的阶段。

二、左丘明的思想

《左传》记录的语言可能是历史人物的实有之语，但材料的取舍、剪裁是受作者思想倾向支配的，而且在行文当中融入鲜明的爱憎情感。左丘明借笔下人物之口褒贬时事、阐述个人看法，特别是《左传》中的评论最能反映左丘明的思想。《左传》中的“君子曰”确系左丘明作《左传》时已有，并非出于后人的附益，这种议论的体裁为先秦史学所共有，一如今之“编者案”。“君子曰”“君子谓”或“君子以为”的评述共八十四条，这些评述直接表达左丘明的心声，也最能体现左丘明的思想。另外，《左传》中直接引仲虺、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的评论话语约五十条，这是左丘明利用他们的评论来表达个人的感想，当然也能反映其思想。

对于左丘明的思想，笔者拟从天道观、政治观、人生观、历史观等几个方面进行粗浅归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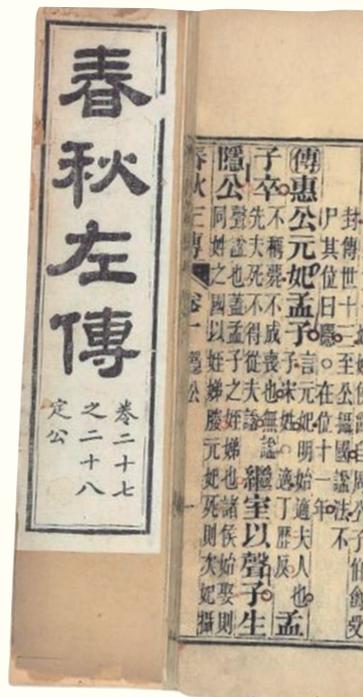
（一）天道观

左丘明虽然尊天敬神，但更重人和人事。反映在他极力反对人祭、人殉，非常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本身的存在和价值，把死后的鬼神放在个体生命的后面。

《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飧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

左丘明借司马子鱼之口来表达他的看法，“祭祀以为人也”，也就是说，祭祀是为了人，并不是为了取悦于神，同时又强调民乃神之主。左丘明对秦穆公赞赏有加，而对他死后人殉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他借用“君子曰”发表了一番感慨：

“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治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文公七年》）左丘明之所以认定“秦之不复东征也”，就是因为秦穆公“死而弃民”，实行人殉。《左传》中有不少鬼神之说，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左丘明的迷信思想。细读《左传》就会发现，左丘明虽然没有否定祭祀鬼神，但并非迷信鬼神，他笔下的贤人君子谈到鬼神是为了劝戒世人。钱钟书先生说：“盖信事鬼神，而又觉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微悟鬼神之见强则迁、唯力是附，而又不



不扬言其聪明正直而壹、凭依在德，此敬奉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玩索左氏所记，可心知斯意矣。”左丘明正是在当时不能完全否定鬼神的历史背景下，利用鬼神之说扬善赞德，钱钟书先生可谓一语中的。

左丘明的天道观总起来说是注重人和人事，远离鬼神和天命，把天和神作为虚设和外壳。他走出了西周时期的天神的神秘主义，注重现实，推崇理性。

（二）政治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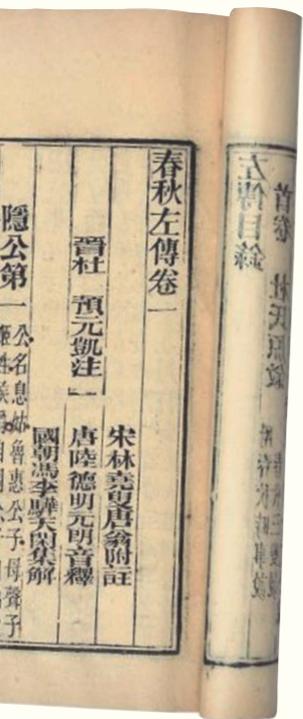
左丘明的政治观博大精深，概括起来是：以德为原则，以礼为规范，以民为根基，辅之以刑。

左丘明就是通过历史事实来阐述德对于国家、战争和个人的重要性。《左传·宣公三年》记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表达的正是德政是政治根本之意。左丘明在论述城濮之战时说晋侯在战前训练百姓，让他们“知义”“知信”“知礼”，而战争中晋军重视德行，将领配合默契，这样就自然而然的让读者接受晋军胜利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实际上是说德在左右着战争的结果。而对于个人更是有德者成就功业，无德者身死国亡。礼是宗法社会的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上自国之大事、外交往来，下至宗庙的定制装饰、进退礼节等等都属于礼的范围。《左传》解经也多以“礼也”“非礼也”为注脚，“礼”字在《左传》中出现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同时期的古书都要多。在《隐公十一年》中记有左丘明的话：“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丘明把礼提高到国家的躯干，天子奉行的规范，天地之经纬的程度，奉行礼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左丘明在《左传》中要表达的礼并不仅是揖让进退之礼，还有更深的含义。公元前547年，鲁昭公到晋国去，从郊外慰劳一直到赠送财礼，自始至终从没有失礼。由此晋侯对鲁昭公不懂礼之说感到困惑，女叔齐解释说：“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昭公五年》）

女叔齐认为鲁昭公仅懂得“仪”，这是礼的表面形式，而不是真正懂礼。真正的礼是用来保国、推行政令而不失去百姓的。鲁昭公的政令出自私家，不能使用贤人，触犯大国的盟约，欺负弱小国家，趁人之危，不能养活百姓，却琐屑地急于学习仪式，这是本末倒置，根本称不上是懂礼。左丘明禁不住赞叹：“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昭公二十五年，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子太叔对曰：“此仪也，非礼也。”左丘明所津津称道的礼就是女叔齐所说的守国保民之礼，而不是外在的各种礼仪礼节。在此，他把礼的涵义又拓深了一步。钱钟书曾谈到过《左传》中的礼，说：“足见‘礼’者非揖让节文，乃因事制宜之谓；故射仪则君子必争，戒礼则君子亦杀。”

为政者中的开明人士对民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如《庄公三十二年》所记史嚚所说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邾文公迁都的事例更是让人过目难忘：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邾文公能把民之利益放在个人的前面，只要对民有利，虽然有可能影响他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并发出“活着就是为了抚养百姓，而死得或早或晚，那是由于命运



的缘故”的豪言壮语。左丘明写到此处不禁感慨邾文公是知天命的人。

左丘明强调崇德、崇礼、重民，但是也不否定用刑作为辅助作用。“政以治民，刑以正邪”（《隐公十一年》），即政用来治理百姓，刑用来纠正邪恶。左丘明主张量刑时坚持“慎罚”的原则。《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所载楚国声子的主张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德行得体为止，如不得体，宁多赏也不能滥刑，以免伤及无辜。“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兴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利其淫。”

（三）人生观

左丘明人生观的内容也很丰富，主张人要具有忠、孝、信、善、谦等品质。在他看来，人只有具有这些优良品质，才具备了理想人格。晋楚之战后，荀林父请求处死自己，而晋君因为“荀林之事君也，进思尽忠”而让他官复原职。郑庄公与其母姜氏在黄泉相见传为佳话。左丘明接着又以“君子曰”的方式称赞道：“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是之谓乎！”（《隐公元年》）桓公十二年，鲁郑以为宋国不讲信用而攻打宋国，左丘明又说：“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他认为如果信用跟不上，结盟也没有什么好处。多次结盟反而动乱滋长，这都是因为没有信用。左丘明崇尚善而反对恶，他曾说过“善不可失，恶不可长”（《隐公六年》），要人们保持善行。《左传·襄公十三年》记晋国将帅彼此谦让，晋国的百姓因此和谐，诸侯也因此亲睦。左丘明在此说明谦让的作用：“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乐夔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讷愿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

左丘明把晋国的兴盛归功于举国谦让，可见“让”的重要性。

（四）历史观

左丘明仍认为君主是天之子，由天选定，“君，天也。”（《宣公四年》）在正常情况下提倡“君命无贰”（《成公八年》），即要求臣绝对服从君命，“君命，天也。”（《定公四年》）“君命无二，古之制也。”（《僖公二十四年》）但同时，他对君的绝对权威也表示怀疑，从历史的交替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昭公三十二年》）的结论，认为历史就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国君不能以为权力乃为天授就胡作非为。也就是说，历史上没有永保天下的社稷之主，倘若不以民为本，为政不以德礼，就有可能被赶下台。如《闵公二年》记卫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戴着粗帛帽子，努力生产，教导农务，重视教化，任用有能力之人，结果仅用一年的时间，战车就由三十辆变成了三百辆。僖公九年，宋襄公即位后，让具有仁爱之心的公子目夷做左师，以处理政事，宋国于是大治。虞国的灭亡是由于虞国国君的无德。

三、小结

总之，人们在读《左传》这部名著时只注重其历史价值，而往往忽略了其作者左丘明的思想属性。左丘明是一个大儒，他的著书《左传》宣扬了“尊礼”“敬德”“保民”“慎罚”等思想，发扬了儒家思想的经义，从而奠定了后世儒学的理论根基。他对于阐释孔子思想，传承儒家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左丘明的大儒地位一直被忽略，成为被遗忘的儒者。左丘明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更是一位出色的儒学家，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应该予以重新评价。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 (三)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为祖国河山写照

之先在北京时期，画画的面比较宽，比较杂，西画、国画都画；国画中山水、人物、花卉都涉猎。李可染曾说：“挖井七八个，一个也没挖出水，不如集中力量挖一口井见水。”之先按照这个教导，在此后的20多年，侧重画国画山水。

1978年冬，应山东人民出版社之约，之先和车天德商议一起画泰山。泰山为五岳之首，它的雄伟高大著称于世，有史以来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它顶礼膜拜，但在中国绘画史上还没有人真正全景式地表现泰山。之先和车天德接到任务首次登山恰值寒冷的冬天，他们背上画板、干粮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登，虽然穿着棉衣也冻得浑身冰冷，直打牙颤。到达极顶后，进行实地写生，他们穿着棉大衣，戴着厚厚的手套，浑身还如掉进冰窟，但他们还是坚持把该画的素材画完。为了画好泰山，他们二人和后来的于太昌曾



八次登泰山，一呆就是半年。为了达到每处名胜与画面意境的完美统一，他们对泰山的岱庙、王母池、普照寺、红门宫、经石峪、中天门、南天门、碧霞祠、岱顶等40多处名胜都作了认真细致地考察和写生。他们凭着对祖国山河的痴爱，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了三米长卷《泰山揽胜图》。此长卷吸取了《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古代长卷的特长，构思严谨，采用写意笔法，用浅绛的色调，既表现出泰山高大雄伟的气势，也细致刻画了各个景点的秀丽风貌，既画出泰山的形，也表现出泰山古老的历史内涵。长卷由著名文学家茅盾题签，于198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问世后爱好者争相购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之先的山水画走向成熟的时期。他为了开拓视野，“搜尽奇峰打草稿”，忍受着晕车晕船的痛苦，遍游祖国名山大川，峨眉山之秀，华山之险，九华山、普陀山之佛气，雁荡山之奇幻……尽收眼底，九曲黄河、长江三峡、桂林山水都留下他的足迹，他挥毫泼墨，速写盈篋。他充满激情，文思泉涌，创作出一系列佳作：如《灵岩胜境》《蓬莱仙阁》《黄山梦笔生花》《峨眉清溪》等。

之先的山水画，有高超的造型能力和深厚的笔墨功夫。由于他有登山临水的感受，加上他对李成、范宽、石涛、李可染、傅抱石等名家作品的临摹、研究，故其山水画能将传统技法融汇一起，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气息相融合。他长于长卷巨幅的处理，擅于建筑的刻画，在画中山石、林木、屋宇、舟楫逶迤连绵，有咫尺千里之势。之先的山水画清新，秀美、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因此受到专家和广大群众的喜爱。如1982年创作的《四季山水》四条屏、印数达130多万份，获省美术创作二等奖，并在省美术创作会上受到表彰。

九十年代以后，之先学习齐白石衰年变法，正如王火先生评价：“每见到他的画感到人与画俱老，他的画似在渐渐摆脱具象的束缚，在笔墨境界上重视骨气沉着。”他多用泼墨和意象手法作画。其画逐渐由清新秀润的工细，转化到追求质朴、苍浑、奔放的大写意上来。作画善用阔笔、乘兴挥毫、意与神会，或润墨点染、或枯笔皴擦，不刻意于局部的雕琢，而是追求一种大块整体的艺术效果。

晚年的画更注重神韵，不满足于画山水的外形，黄宾虹大师说：“造化，天地自然也，有形影，常人可见，取之较易，造化天地，有神有韵，此中内美，常人不可见，画者能夺得其神韵，才是真画。”之先深得其中三昧，他通过长期观察，深刻体会，把握了山之神水之魂，并用笔墨把它重现出来，因此其画有神感人。

钟馗的故事千百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钟馗并非历史上真实人物，而是华夏民族在崇神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一个神祇形象。据传说唐明皇生病，梦见一大鬼捉小鬼啖之，大鬼自称钟馗。明皇下诏令丹青圣手吴道子为之造像，遂使钟馗故事家喻户晓。钟馗貌丑心美，扶正压邪，因而深得劳动人民喜爱。历代画家黄筌、高其佩、金农、任伯年、齐白石、徐悲鸿都画过钟馗，寄托他们褒正义，贬邪恶的思想。之先早在1950年，曾作昆曲《钟馗嫁妹》图。改革开放以后，根据现实的需要着手画钟馗专题，意欲创新这一形象。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他画了百余幅钟馗，开了数次钟馗专题画展，并出版了画集《皮之先钟馗百图》。

为了创新钟馗的形象，之先首先加强扩展他广义的内容。他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找到了创作的切入点，使钟馗这一形象不仅是现实的表象世界，更具表象背后的深厚意蕴，使形象超出他本身的含义。在他的笔下，钟馗神态各异，丰富多姿，一改过去那决眦裂口凶神恶煞的形象，在保留其威严肃穆、凛然不可侵犯的特点的同时，又赋予其善良温厚、和蔼可亲的气质。其中《迎福图》《马上得福》《欢欢喜喜过个年》等，寄托了人们对幸福安定生活的期望；《不孝图》则鞭挞了现实生



活中逆子欺母，忘恩负义的罪行；《尖头鬼》则揭露了那些善于钻营者，无孔不入的可憎嘴脸。对于社会上各种骗子的不良行为，画家更是深恶痛绝，在他的《画皮》《两面鬼》《真假钟馗》等画中，对那些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各种丑行进行了深刻的讽刺。

之先的钟馗画再一个突出特点，是他自作的那些幽默而又辛辣的题画诗，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两面鬼》一画中写道：“当面奉笑脸，背后施计端。劝告世上人，莫遭鬼暗算”。在《捉贪图》中写道：“世人都晓做官好，贪赃枉法实可恼。丰都做鬼不觉死，金钱美女忘不了。”在《真假钟馗》中题道：“世事多纷纭，假中也有真，真中也有假，真假实难分。黑白成颠倒，欺骗世间人，你说他是假，他说我是真。此图画成后，作者也难分。一时看不透，莫把假作真。心细眼要明，真者自是真”。这些题画诗针砭时弊（临沂有人造之先的假画，使之先深受假画之害。此诗也包含作者的深刻感受），可谓入木三分，充分表现作者对社会所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的无比憎恨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之先的钟馗画融诗书画于一体，俗话说“画是有形诗，诗是无形画”。无声的画，配上有声的诗，可使画更充实，意蕴更深。同时他以书法的用笔入画，笔墨深厚，线条轻重缓急有运动感。在他的作品中无不体现出深厚的文学修养，书画功力及娴熟的艺术技巧。早年他学过吴道子、唐寅、徐悲鸿、蒋兆和的人物画，在中央美院学习又掌握了画素描、画人体的西画技巧。在笔墨色彩上既有传统画之长，又吸取西画之优点，运用勾勒填彩、兼工带写的技法和夸张变形的漫画形式，并有民间绘画的朴拙，可谓雅俗共赏，令人耳目一新。黄均教授在《题钟馗百图》一诗中这样评价：“善恶人间望眼穿，钟馗百纸看之先。凛然正气凭图写，寓意深长醒世篇”。书法家孙轶青题：“捉鬼降妖，扶正压邪”。

1996年山东电视台及卫视台《文苑》栏目中播放了《皮之先画钟馗》，影响很大。

山东抗日军政学校

本 编



1938年7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在莱芜的一个小山村里创立了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起初称之为干部训练班，也叫随营学校。8月，从第二期开始迁至沂南县岸堤镇驻地岸堤村，改名为山东抗日军政学校，又称岸堤干校。

1939年11月，岸堤干校与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合并；1940年初，又并入从晋东南来鲁的抗大第一分校，编为其第五大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荣桓率八路军山东主力部队挺进东北，抗大一分校亦随之北上。

1946年2月，何长工率领的延安抗大总校挺进东北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抗大一分校即编为该校第三大队，后不久，学校转移到齐齐哈尔市，抗大一分校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山东抗日军政学校的成立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军政骨干，缓解了抗战初期干部缺乏的困难。

钢八连连长鄢思甲

高雷



“钢八连”是沂蒙山的荣誉，鄢思甲是沂蒙人民的骄傲。“钢八连”前身是八路军滨海军区四团八连，是八路军中屈指可数的功勋连队，鄢思甲是“钢八连”领军人物，八路军山东军区十七名一级战斗英雄其中的一位。

鄢思甲（1916-1985），河南省光山县砖桥乡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8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九团七连通讯员、警务员、班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补充团通讯排副排长、排长，六连副连长、连长，教导二旅一团六连连长，滨海军区四团八连连长，三营副营长、营长，参加了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区多次反击日军“扫荡”的战斗，1944年8月被山东军区授予“一等战斗英雄”“模范指挥员”等称号。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教导大队队长，第二军分区一团副团长、团长，鲁中南军区滨海军分区参谋长，率部参加了保卫山东解放区的战斗和淮海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九师参谋长，一〇〇师参谋长，山东军区临沂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六十八军守备第十八师师长，山东聊城军分区司令员，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

滨海军区四团（一一五师教二旅四团）八连有几个老战士，平素很调皮，团长都敢开玩笑，打起仗来也厉害，厉害的有些地方你都不敢相信，比如说吧，大白天的敢越过两百米的开阔地，在敌人机枪的封锁下，硬是把炸药扛到了敌人的碉堡底下。这几个老八路，凭着打仗勇敢傲气得很，一般人不放在眼里。有时他们犯了错误，大家批评他们的时候，他们通常是这样说：“算了吧！算了吧！别说漂亮话啦。咱们打仗的时候看？”但是他们这一套一碰到鄢思甲，就施展不开，也不敢施展了。因为鄢思甲连长比他们更

勇敢，更沉着。

八路军中参加过长征的同志那绝对是老资格，而鄢思甲更有着不寻常的经历。长征的时候，鄢思甲在红四方面军当通讯员，一天夜晚，他受领任务去一营营部送信，家常便饭，应该没有悬念，恰巧这边鄢思甲刚出发，那边营部就转移了，白军占据了村子，刚到村口，鄢思甲就听岗哨发问：“干什么的？”

“送信的。”黑灯瞎火的，鄢思甲也没细看就进了村，满街横七竖八的躺了些大兵，岗哨来来回回走动。

“干什么的？”又有人问。

“送信的。营部在哪里？”鄢思甲问。

“东头。”

到了东头鄢思甲再打听，却被告知一营在南头。鄢思甲一愣。这个村子住了几个营？他多了个心眼，弯腰向脚底下躺着的士兵头上一摸，不是八角帽，他深吸了一口凉气，加快步伐向村外走去。到了村口，冷汗就下来了，他就琢磨：你吓我一跳，我也不能叫你安稳了。

他摘下枪，朝着模糊的人群中开了两枪。只两枪，这下就热闹了，机枪、步枪、手榴弹……整个村子像开了锅一样，折腾了半宿。

那几个老战士佩服鄢连长，不是他的过去，鄢思甲懒语得很，自己不讲，调皮鬼也无从了解他的历史。他们佩服的是“鄢连长打仗真有点办法”！“跟鄢连长打仗，不会吃亏。”他们都愿意在鄢思甲的连队当战士。

1943年麦子快熟的时候，鄢思甲带领八连跟副营长到陇海路南去保卫麦收，两昼夜行军，部队到达了桑墟鬼子据点附近的刘寨宿营。第二天拂晓，县政府就送来情报，沭阳增援桑墟伪军百余，鬼子七八个，已经上路，希望他们把这股鬼子痛打一下。当时的情况有很多困难：刚过路，人生地不熟；敌情尚未进一步侦察核实；并且离鬼子据点太近，容易两面受敌。副营长略加考虑，下决心说：“来了就是为了保护群众，打吧。”

地方为了支援部队作战，也象征性地派来了一个武装班。

早上八点钟，沭阳方向尘土滚滚，敌情大变，伪军四百人，鬼子近百一起向刘寨扑来。钢炮、迫击炮、机枪一齐响了。敌人的数目和火力超出了我们好几倍，副营长传来命令：“边打边撤。”

双方交火粘上了，怎么撤？二排长徐乐之跑过来向鄢思甲说：“连长！我们不能给敌人屁股啊！”

“打你的仗去吧！”鄢思甲不经意地说。

营部的第二次命令：“边打边撤。”

鄢思甲发燥了，回答：“回去告诉副营长，不能撤。”

第三次命令又来了，仍然是“边打边撤”。鄢思甲知道已无法抗拒，在两兵对接的喊杀中，他深情的望着自己的部下，寻找着撤退的最佳时机。这时副营长自己也赶到火线上来了，鄢思甲坦诚的报告说：“撤退，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那么，能坚持到下午四点钟吗？”

鄢思甲很干脆的蹦出了一个字：“能！”

“好，打吧！”副营长表态。

这时，一股伪军正冲向一排阵地前约五十米的一块坟地，敌人占据了这块有利地势，八连有可能被分割为两段。鄢思甲一溜小跑奔向一排，命令说：“冲上去。”伪军距离坟地只有十几米远了，鄢思甲拽过三班长的步枪，“乒、乒、乒。”三枪打倒了两个敌人，喊了一声：“跟我来。”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坟地被

我们抢先占领了。

敌人的火力转向了二排，鄢思甲又奔向了二排，“沉着！卧低些，再卧低些。”他告诫四班的战士。

全线最突出的五班阵地，前后落了六十几发炮弹，他又出现在五班的阵地上，“炮弹不能解决战斗，五班打得不错。再沉着点呀……”。

敌人向右翼运动，地方武装那个班有一个同志负了伤，另外几个同志架着他退了下来，鄢思甲没有阻止他们，而是喊道：“我们来一个班，……快，快点，……机枪也过来呀！……堵住缺口。”

一个连散布在三里长的单薄战线上，这个三十来岁的老同志来回奔跑指挥着、战斗着，哪里紧张便会出现哪里。哪里都能听到他那豫南夹杂着四川口音的鼓动声音。

外线的敌人向哪里运动，内线的机枪也向哪里转移。敌人永远搞不明白八路火力究竟有多么强。

伪军冲锋，鬼子在后面督战，鄢思甲指挥机枪集中火力打伪军，伪军吃了三次亏，后来鬼子冲锋，伪军便蹲在玉米地里“看热闹”了，鄢思甲命令一挺机枪监视伪军，另外的机枪全部倾泻到鬼子阵地。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半，敌人的五次冲锋都失败了，鬼子不敢再消耗下去，丢下了十四具死尸，伪军则伤亡了五六十，缩回据点里去了。我们牺牲两名同志，三名同志负伤。

战斗结束之后，鬼子抓住了伪军的情报员痛骂到：“八连？是八个连！四挺机枪？四十挺机枪！”这就是敌人眼中的八连。

战斗总结会上，鄢思甲强调说：八连是人民的子弟兵，“驻地廿里以内发现敌情，不要等待命令，都要跑步增援。”而他自己亲自指挥的解救岢四区村公所的被围，增援曹郭庄民兵等战斗，就都是没有等到上级命令而主动参与的。尤其是1943临近春节的朱村战斗，更充分体现了八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战斗宗旨。直到现在沭河两岸的老百姓还都感念着“钢八连”。

1943年1月24日，正是1942年的腊月除夕。东方刚刚放出鱼肚白。为年事操劳了一天的沭河两岸群众多数仍沉睡在梦乡，八连的巡逻哨巡哨朱村西北方向时，发现天空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跟着，沭河对岸的曹庄上空升起了火光。“不好，敌人出动了！”鄢思甲接到哨兵的报告后，判断“这一定是鬼子”，当即命令通信员：“快去报告营部，我们要出发！”回头又对指导员说：“这样吧，我带一个班先走，你带连主力随后跟来，我们保卫群众过年！”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判断，兵贵神速，鄢思甲抢占了先机，他几步赶到街上，就看到六班的战士已经荷枪实弹在院里集合完毕，房东大娘闻声赶出屋，看队伍集合，忙上前问：“怎么，孩子，你们要走？”“不走，大娘。”鄢思甲拉住大娘的手，故作轻松地说：“可能鬼子出来了，我们去看看，还回来。”说罢，他朝六班一挥手：“咱们走！”“都留点神，大娘还等着你们回来吃年夜饭，吃饺子呢！”八连驻地距离朱村只有10多里，隔着一条沭河。当八连刚出村，到营部送信的通信员跑回来了，气喘吁吁地说：“连长，营长、教导员说咱们连（几天前）刚打完仗回来，让七连去呢。”鄢思甲不假思索地说：“你再去报告营长、教导员，就说我们已经出发了。”说着，带着六班向小桥跑去。说是小桥，是说它窄，它长可有几百米。这时漫天遍野的老百姓，背筐的、挑挑的、牵驴的、推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抗着过年蒸得发团，提着没压完的豆腐脑……逃难群众乱作一团，纷纷向河东涌来，堵塞了小桥。鄢思甲询问才知道，老乡们有曹庄的，有朱村的，还有彭古村的。鄢思甲站在桥头，高声喊道：“老乡们，让开路，让我们过去！”许多乡亲们也随即呼喊：“乡

亲们，老四团来了！”“我们有救了！”“主力来了，快让八连过去呀！”

人们纷纷向两边闪去，许多人跳下了河滩，大家注视着六班的背影，向西方望去。河滩上一位老大娘跪在那里祈祷：“阿弥陀佛！保佑八路打个大胜仗吧！”

指导员带着八连的主力过去了。营长、教导员率领七连和九连跟上来了。惊慌的人群镇静了下来，大胆的人们坐在河滩上，解开了包袱，拿出煎饼开始早餐。

鄢思甲带着六班一口气跑出了几里路，碰到一个逃难的老汉，了解情况，老汉说，鬼子大概有五六十人，伪军二三百人，刚作害了曹庄，现在正在祸害朱村。言语间，谭指导员带全连赶到了。鄢连长这时把枪一挥，下达了命令：“跟我来！”

朱村是沭河西岸一个有上千户人家的大村。连队赶到村口时，只见日伪军正在朱村烧杀抢掠。鄢思甲当即指挥连队兵分三路开进，向敌人包抄攻击。六班长张昌全带全班一马当先，首先与敌人接上火，他们迅速占领朱村旁的小树林，用轻机枪、步枪火力掩护全连迅速展开。而后，二排在排长赵吉祥带领下，迅速从村东南头插进。因敌人是出来抢年货的，见有八路军前来参战，一时弄不清有多少人，一伙人慌忙龟缩到一个财主的大院子里，把墙洞掏通，“嘟嘟”往外打机枪，压制着八连的进攻。由于院墙高，距离远，手榴弹够不着，连长鄢思甲急得头上直冒汗。正巧，战士裴飞正看见街边靠着一个粪叉，他急中生智，将一枚手榴弹放到粪叉上，导火环抠出来，绑在叉齿上，他平端着，用劲往院里一甩。手榴弹悠悠飞过去，不偏不斜，掉进独立房的院中。随着“轰隆”一声爆炸，传来一阵惨叫声。

“好办法！”裴飞正如法抛掷，又接连用粪叉扔出两颗手榴弹，很快就把院里炸得烟雾腾腾，敌人报销了。就在村里的敌人被消灭后，村外的日军开始反扑过来。由于敌人来势凶猛，火力又强，张班长率六班战士迅速占领了村里一个院子进行防守。敌人进攻开始了，张班长把全班分成三组分头抗击。战斗持续了三个小时，打退了敌人六次冲锋。在激战中，六班长张昌全和班里不少战士相继牺牲。

伪军溃逃了，剩下的五十多名日军，也仓皇地钻进了村东南边的柏树林，八连包抄了上去。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鄢思甲被一颗子弹打伤了左脖颈，刚刚包扎好，他又冲上火线，继续指挥；一排长秦家龙负了重伤，一班长焦锡模一只胳膊被打断，仍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战士郝红娃的腿负了重伤，简单包扎



滨海军区四团一部

了一下，就又拖着一条腿冲上去了；还有许多战士，身上多处负伤，仍坚持战斗。民兵也上来了，各救会组织乡亲们主动担负了战场的勤务，甚至有的乡亲手里拿着手榴弹，腰里捆着手榴当弹，嘴里衔着手榴弹，在敌人重机枪密集扫射下，几次往返战场给主力送弹药。

敌人步步败退，企图夺路逃命。我们紧咬不放。八连一排副排长安吉然勇猛地冲上去，同一个敌人扭打在一起，敌人拉断了手中的手榴弹弦，妄图把安吉然吓倒，以便趁机逃命。安吉然毫不畏惧，死死抓住敌人不放。伪军只好将手榴弹抛出，俯首就擒，当了俘虏。经过激烈战斗，柏树林被我们夺下来，敌人又逃进村西南角的一个小沟里，我们部队又迅速追击过去，在敌我相距三十米的窄小地段，展开了一场激战。直到午后两点多，敌人施放了烟幕，在增援部队的炮火掩护下，扔下了七具尸体，像丧家犬似的逃进大哨据点。在追击下，我八连四班长任德喜还活捉了一个日军士兵。

战斗胜利结束了，朱村的乡亲们陆续回到村里，看见家里的年货、家什样样完好无损，个个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纷纷跑出家门，请八连的同志到家里一块儿过年。而八连的同志觉得赶走日军，解救乡亲是自己的责任，不能再给群众添麻烦，坚持要连夜赶回驻地顶子村。八连要走了，乡亲们男女老少眼含热泪一直把连队送到河边。

在返回的路上，八连的同志悲喜交集，他们即为这次保卫人民，打了胜仗而高兴，又为牺牲的战友难过。但是，为了不影响驻地村群众的过年情绪，全连达成共识：进村后只讲这次战斗的胜利，不提牺牲的战友。谁料，八连的同志刚刚踏上驻地顶子村的桥头，就被那里久候的乡亲们包围了。乡亲们一眼就看出了八连的伤亡情况，心情顿时变了样。民兵王胡昌的母亲在队伍里喊着、叫着，一定要寻找住在她家的机枪班长刘希权。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在队列里像找自己的孩子一样，逐个查找住在她家的战士，当她一遍又一遍的查找，没有见到小张和陈时，知道他俩是在战斗中牺牲了，顿时嚎啕大哭。在场的人们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悲痛，放声痛哭起来，边哭边呼唤着牺牲同志的名字。鄢思甲嘴边有句话：“打仗不真心为了老百姓，老百姓哪能这样拥护我们呢？”

在朱村战斗中，八连与两倍以上兵力的敌人激战，消灭40余名敌人，伤敌70余名，活捉1名鬼子，迎来了1943年的新春佳节。为此，24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后不久，朱村的干部带领群众，专程来到顶子村慰问八连，他们赠给八连一面锦旗，旗上绣了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钢八连”。从此，“钢八连”的名字就叫响了。1944年8月，在山东军区战斗英模大会上，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式命名八连为“钢八连”。

滨海军区老四团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一等主力，“钢八连”这支红军连队就是主力的尖刀。1944年8月山东军区战斗英模大会共评出17名一等战斗英雄，老四团4名，其中“钢八连”3名，当时，记者曾采访过这支英雄部队的领头人鄢思甲，他自谦的说：参加革命十几年就闹了十几年的个人英雄主义。刚当连长时一打仗就带着两个通讯员，一句话“跟我来”。那次秦世塘战斗一开火，自己带着一个排长和一个通讯员就冲进了围子，敌人一梭子机枪，自己和排长都负了伤，整个连队的力量没有发挥出来，胜仗打了个平平常。最后他重复地说：“我是连长，我不能只起到一个英勇战士的作用。”

王璟的传说

微莒南

王璟，莒南县板泉镇大白常村人，出生于明正统十二年（1446年）正月二十，卒于嘉靖十四年（1532年）九月二十七。一生历经英宗正统、代宗景泰、英宗天顺、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七个年代。他于成化八年（1472年）中进士，在朝为官50余年，辅佐过宪宗、孝宗、武宗和世宗四代皇帝，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卒赠太保。他一生勤政为民，政绩卓著。特别是他耿介忠直为政清廉的气节，在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上被后人奉为楷模，清名传颂至今。他一生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在位期间不避权贵，先后革除皇庄、统理盐法、抗击鞑靼、肃平冤狱、赈济灾民，深得朝廷倚重；去世后，世宗皇帝十分悲痛，曾亲自御封，赐御祭九坛，对国家的贡献可见一斑。

大白常村的后人都尊称王璟为“王都堂”，关于他一生的传说也很多……

王璟出生

大明年间，天下太平。万岁皇爷端坐金銮殿，紫禁城里歌舞升平，十分热闹。

这天，皇上心想，“虽然现在天下太平，但山高皇帝远，不知江北江南的黎民百姓生活得怎么样？”于是就跟贴身的大臣商量，是不是该一路私访到江南？君臣最后商量好了，就安排好朝中的大事，然后不叫众人知道，君坐车、臣骑马上了大路。

这天来到山东沂州地界，早早地找了个客栈住下，把车马放在客栈里，叫手下的人看管，自己和大臣换上了便衣，好去微服私访。君臣二人随便来到沭河东岸的一个紧靠河的村子，想找村里的老百姓了解了解民情。可“六月的天，哭孩的脸，说下就下”，一会乌云就上来了，下起了倾盆大雨。君臣慌了，看见大街左边有家高大的门楼，就赶忙跑去避雨。

只见大门紧关着，但可以听见里边屋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也有一阵阵喊痛的呻吟声。君臣二人心中正在纳闷，忽听见里边屋里传出了婴儿出生的响亮啼声。里边的女人们都笑了，说：“是个大小子，这回可好了，有孙子了！”二人什么都明白了，原来这家刚出生了一个男孩。

君臣互相使了个眼色，皇上说：“这个孩子真有福，出生时还得咱君臣二人来把门。”大臣也说：“孩子长大后必定是栋梁之才，就不知能官称几品？”话未说完，只听见院里的一个老妇人说：“俺老百姓庄户人家的，不要几品的大官，有一品就行了。”

原来是孩子的奶奶正走出屋门，向院子里的阳沟泼接生过的脏水，听见门外有人说话，问“孩子官称几品”，她还以为越品多官就越大，心想“有个官做就怪好”，所以说“庄户人家，一品就行”。刚出生的这个孩子就是王璟，他的奶奶真会说话，后来还真应验了她的话。

王璟赶考

王璟从小聪明伶俐，七岁时爹娘把他送到南学把书念，老师教的点到就会、过目不忘，显得才华出众。17岁去北京应试，赶考的路上路过一个村庄，天黑了没奔上客栈，就在一家农户里住下了。

这家农户的夫妻俩刚有个不满一岁的女儿，常常日夜哭啼，而且越是到晚上哭得越厉害，刺耳的哭声令夫妻二人经常彻夜难眠。说来也怪，王璟在他们家住下后，孩子竟一夜睡到天亮也没哭。第二天王璟走了，孩子睁开眼看了看，又“哇哇”地哭起来。夫妻俩一想，这赶考的书生肯定是个贵人，他住了一夜女儿一夜没哭，他走了却又哭，于是就赶紧去追王璟。

王璟没走多远，夫妻俩追上，说明了来意。王璟说：“只要我在你家，孩子就不哭？可我急着去赶考场，不能长住在你家呀！”之后想了想，说：“那这样吧，我给写几个字，你们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就行了。”说完拿出笔墨、取出纸张，写了四个大字“王璟在此”。夫妻俩回家后，把字放在了孩子的枕头底下，果然孩子夜晚就睡得香甜，不哭了。

夫妻俩喜得逢人便说：“多亏了那个过路君子，俺家孩子的哭病好了！”从此以后，凡是有孩子哭夜的，人们就写个帖子贴在大路口的树上或墙上，男孩哭夜就写“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哭夜郎，走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出太阳”；女孩就写“天绿绿地绿绿，我家有个哭夜姑，走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太阳出”。

朝中为官

沐河两岸有个风俗，就是老人在没死之前，喜欢先修好坟墓，民间叫“喜墓”。王璟的爷爷，也砌了喜墓。地理先生看过基地说：“要是用上此墓，老王家下七辈就能出个朝里一品的大官。”

那年王璟正好五岁，趴在爹的背上正听大人们说话，听地理先生说“这穴地用上，下七辈能出京里的一品大官”，就急忙抢着说：“不用等到下七辈了，把上七辈的老老老爷爷起上就行。”所有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孩子小小的年纪，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先生看了看孩子，见“天庭饱满多主贵、地阁方圆不受贫”的样子，心想一品大官也就在此人身上了！于是就按孩子说的做了。

王璟聪明伶俐、勤奋好学，读起书来跟吃书一般，25岁中了举人，二十六岁

中了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称都堂大人。

王璟才华出众，真会理财和理事，替皇上执掌后宫，成为粉黛三千的后宫总管，把所有后宫的琐细之事处理得条条有序。后宫平安了，天下就太平，皇上于是龙心大悦，想下去微服私访一趟，也顺便看看沿途的美景，就放下了国事，叫都堂王璟掌国三个月，放心大胆地去游玩观景了。

正值茂春，御花园内百花争艳、百鸟齐鸣、蝶飞蜂舞，正宫娘娘叫王璟陪她观花赏春。见王璟年轻英俊、人才出众，心中不免产生了爱意，就故意在下台阶时把凤鞋崴掉。因为古代女人都是三寸金莲脚，娘娘自己不便弓腰提鞋，于是有意调情，就娇声娇气地叫王璟把她的凤鞋给提上。

常言说“伴君如伴虎”，王璟为官历来小心谨慎，从不敢违反皇规，况且古代有“男女授受不亲”之说，就不敢用手直接给娘娘提鞋，于是拿手绢把鞋后跟包好，趴在了地上，用牙咬住娘娘鞋后跟的提鞋布，慢慢地给提上了。

娘娘见他那忠厚老实的样子，笑着说：“王都堂呀王都堂，你算是一辈清官做绝了！”王璟一听吓了一跳，趴在地上没敢抬头，额头上直冒冷汗。娘娘自知失言，接着说：“王都堂，叫你子孙代代都做官。”王璟这才谢恩起身。

王璟的后人并不多，可他为官清廉的名声很大，大白常姓王的都是他的传人。后人说，“大白常出了王都堂，姓汪的也改姓了王！”

锦鸡落江南

王璟在朝为官50余年，辅佐过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代皇帝，为维护大明江山做出了贡献，是明朝的四代元老和功臣。他曾37次上书辞官，终于在76岁时得到恩准，解甲归田回到沂州府兰山县临沭乡白常社，87岁寿终。皇上很惋惜，于是就皇家拨钱拨物、御批在其老家安葬。

王家请来很有名的风水先生选择墓地，先生看好了村西南湖的一块风水宝地，可以代代高官、人丁兴旺，被御名“石林”，由石人、石羊、石马、石龟等镇林。一切准备安置停当，开始挖墓穴。当时风水先生就吩咐，“千万别挖太深，挖到一



王璟御葬林

丈五六尺深的时候，挖不动的地方就千万别挖了！”先生也不敢离埵（俗语，地方），恐怕他们出差错。

一伙年轻人一会就挖了一丈多深。谁知这时先生突然急着去方便，于是让他们先挖着，马上就来。可是小解完了又想大解，耽误了好一会。等他跑回来时，可了不得了，出了大事！年轻人劲头足，一会就挖到了一块石板，竟然忘记了先生嘱咐过的话，一个后生弯下腰，伸手就把石板给掀了起来。只听“扑啦扑啦”两声，大石板下飞出了两只五颜六色的锦鸡，直下西南方向而去。先生远远地看见，大声说：“锦鸡飞到江南，脉气破了！”气得拿起家什，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时，大伙也傻了眼。有人说：“锦鸡落到江南？那为了家族今后的兴旺，咱就把灵柩葬在江南吧！”另一个人说：“我听先生说锦鸡飞到姜园去了。正好沂河岸有个姜园！”最后，只好又找了个地理先生，在沂河岸的姜园看了一穴好地，就把都堂王璟葬在了沂州府的东关姜园。

实际上锦鸡并没有飞姜园。锦鸡展翅双飞后，飞过了沭河，又飞过了沂河，在沂州府南门南的小土岭上落下来，歇了歇脚，然后直飞江南去了。以后人们把锦鸡落过的地方，叫做金雀山、银雀山。从历史看，不管大明、大清还是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官大都出在江南。

石人偷食

大白常村王璟的御封“石林”，经历了几个朝代的更替后，留下了风风雨雨的见证。尤其是康熙年间地震的破坏，石羊没了角、石马没了尾巴、石人掉了胳膊，所幸之后又被竖起、修复。

传说在清朝时，村里有家人把磨好的煎饼糊子放在磨台上，还没来得及收起来，因为当时天还不亮，就上屋歇了一会。再出屋门时，看见黑乎乎的个人影在偷吃磨台上的煎饼糊子，情急之下，她就用收糊子的尺板狠狠地打了那人的头一下，人影瞬间不见了。

第二天，村里有人看到一个石人的头上粘着煎饼糊子。对于这事，沭河两岸的人们传得神乎其神。

对于大白常御封石林和有关王璟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至今仍在两岸流传。

王璟不仅为官清廉，还经常教育子孙后代清正为怀。嘉靖元年王璟乞休回乡，这时他的长孙王宗贤已官至奉议大夫。为了教育宗贤继承祖风，他亲书“清、慎、勤”三字赠勉。要王宗贤带在身边作为座右铭。王宗贤佩带终身，并取字“效先”，表示决心一生恪守祖训，无愧于乃祖的教诲。其次孙保定知府王宗性去世时，妻孙氏悲痛至极，以至自缢而死。死前将留在身边的次子王应龙叫到床前教诲说：“尔祖官至太保，功绩著于当世，尔伯父官至大尹，皆有清名。尔与尔兄当苦志读书。以继祖，父之志……听我言，不失为忠臣之后。”一个决意自杀的人，死前仍念念不忘一家几代人清正忠直的名声，并要求儿子矢志继承这一传统，不愧为忠臣之后。可见王璟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子孙后代的教育是多么严格，数代后而仍能恪守不渝，足见其人格影响之巨之深之远！

更令人感动的是，在1952年王璟墓搬迁时，打开墓穴后，发现王璟夫妇墓中只有自用的28颗石印章和夫人刘氏随身戴的两个小耳坠、一对手镯和一个铜质发罩，除此以外，竟然连一件贵重殉葬品也没有，甚至连棺材也是平常木料，早已朽烂。一代高官如此清贫，令在场的人无不歔歔感叹。

琅邪稻

平凡

近日，“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到山东临沂进行考察。他说，临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农业自然条件良好，希望与临沂继续加强合作，集中力量发展推广超级杂交稻，保障粮食安全，实现“禾下乘凉”的梦想。

袁隆平看中了临沂这块土地来推广他的超级杂交稻，确实有非常独到的眼光；他说临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亦非虚言。

临沂市的北部、西北部等大部分区域，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地，也就是著名的沂蒙山区。但是，在市区的南部（罗庄区），以及与之毗邻的郯城县北部，苍山县（今名兰陵县）东北部，则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素有“临郯苍，一大片”之说。此处是淮河支流沂河、武河、东沭河的下游，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非常适于种植水稻。临沂是北方水稻主产区之一，水稻种植历史悠久，罗庄有“塘崖贡米”，郯城有“采莲湖香米”“姜湖贡米”等，远近闻名。



长期以来，很多人以为水稻是南方的农作物，北方在古代没有种植水稻。其实，早在春秋时期，鲁国就有水稻种植。《左传·隐公元年》记载：“有蜚。不为灾，亦不书。”《左传·庄公二十九年》记载：“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这两段文字，虽然没有直接记载水稻，却记载了“蜚”这种水稻病虫害。宋代罗愿《尔雅翼》说：“蜚者，似螭而轻小，能飞，生草中，好以清旦集稻花上，食稻花。……既食稻花，又其气臭恶，……使不穡。《春秋》书之，当由此耳。”

关于临沂种植水稻的确切记载，见于《左传·昭公十八年》：“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袭邾。邾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文中的“邾”，是指邾国。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分封天下，封了夏后氏的一个后裔，国号为“邾”。邾国的国都，就在今天的兰山区南坊街道邾古城村一带。邾国的爵位是四等子爵，国君称作“邾子”，是一个较小的国家。这个古地名“邾”，后来改为“启阳”，西汉时为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又改为“开阳”。

所谓“藉稻”，就是耕种水稻。“藉”即藉田，是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地。古代，每逢春耕时节，天子、诸侯躬耕藉田，以示对农业的重视，后来形成了“藉田祭先农”的礼制。公元前524年，邾国的国君正在稻田里亲自耕种，邾国军队突然来袭，国君慌忙躲进城内，邾国军队紧追不舍，攻进邾国都城，把国君的一家老小都抓走了。

关于“邾人藉稻”的这段故实，《新唐书》第一〇二卷《李百药传》也有提及。李百药幼时很聪慧好学，七岁就能撰写文章。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义、马元熙等人来他家中作客，读南朝梁陈间著名文学家徐陵的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正在旁听客人谈话的李百药，及时进言：“《左传》称‘邾人藉稻’，杜预注云‘邾国在琅邪开阳’。”客人大为惊叹，称他是神童。李百药果然不负众望，后来成为一位著名史学家，“二十四史”之一的《北齐书》，就出自他手。

李百药谈论“琅邪之稻”的出处，是以西晋学者杜预的注释为依据。其实他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依据：梁陈间的那位著名文学家徐陵，是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郯城与沂州毗邻，是“临郯苍，一大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徐陵文章中的“将刈琅邪之稻”，正是对家乡农业生产的真实记录。

元代地方志《齐乘》卷二《山水·沭水》也有“琅邪稻”的记载：“沭水有二，东沭出沂州西北其山（城内普照寺有金僧居山颂碑，作其山），南流至卞庄站（国初立站，今废），东分一支入芙蓉湖，溉田数千顷。湖在沂州东南芙蓉山下，香粳钟亩，古称‘琅邪之稻’，即此。西沭出峰州东北抱犊山，东南流至三合村，与东沭合（又有鱼沟水出浮邱山合于此，故名三合），南贯四湖，溉田倍芙蓉。又南，合武河入于泗，谓之沭口，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承县界有陂十三所，皆贞观以来修立以溉田者。今沂、峰二州，仰沭、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与为匹，皆十三陂之遗迹也。”

按照《齐乘》的记载，沂州境内的东沭水，发源于费县，向南流到卞庄（今兰陵县政府驻地），有一条分支，向东流入芙蓉湖，“溉田数千顷”，种植“琅邪之稻”。芙蓉湖所灌溉的数千顷田地，位于卞庄以东，正是临沂市罗庄区、郯城县、兰陵县的交界处，即“临郯苍，一大片”之所在。而西沭水在三合村（也属兰陵县境）与东沭水汇合后，“溉田倍芙蓉”。可见当时鲁中南山区能涵养大量水源，供下游大面积种植水稻，正像袁隆平所说的“农业自然条件良好”。

清初诗人李良年的《秋锦山房词》有“生子当为丰岁谷，读书早辨琅邪稻”，说的也是临沂的水稻。

刘中策、刘中瀚书法及佚名画册 (上)

高昂

刘中策（1843—1905），后更名纶襄，字蓉舫，次方，蓉芳、坎方。沂水县院东头乡刘家店子村人，刘中瀚二弟。出身于沂水望族，翰墨世家。光绪二年丙子恩科二甲第五名进士，翰林，散馆授编修，选翰林院庶吉士，为沂水明清两朝考取名次最高第一人。光绪十二年、十五年两任会试同考官。十四、十五年两任顺天同考官。任督理街道衙门钦命督理街道掌河南道监察御史，其刚直不阿，敢于直谏，深得光绪皇帝的恩宠，但得罪了吏部尚书麟书，因此被罢官，1894年被恭亲王起用为陕西试用道台，诰封通奉大夫。一生坎坷，光绪三十四年（1905年）歿于陕西任所，有政声（一说外官至山西候补道），追赠二品顶戴，照布政使赐恤。能诗工书，造诣深厚，楷行草均精到，行书出自赵子昂、董其昌，圆腴丰润，笔力道婉；草书出自《孙过庭书谱》，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挥洒有度，独成一体。多作五尺以上大中堂及长幅手卷。

此幅书法作品是刘中策为佚名画册写的跋。内容为：“此册未审何人所作。细观山水诸幅，笔墨秀润，意境超旷，清奇浓淡，不拘一格，而各极其妙，其他花卉树石，亦生动有致，当非庸手所及，予于晴窗展阅一过，如游名山，如逢异境，神游目赏，应接不暇，因跋数语于后，他日重展此卷，当再结一重翰墨也。”





我在山东省立托儿所的日子

艾鲁林



前排站立左一艾鲁生（我三弟）；滑梯上前排左一艾鲁林，左二魏晓路（魏文伯之女），左三杨柏玲（朱则民之女）；滑梯上后排左二杨柏青（朱则民之女）。

每当我翻看这一张张老照片，不禁使我想起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山东省立托儿所里度过的那段令人难忘的幸福而又短暂的美好时光。

那是1945年8月，我们国家经过了八年艰苦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日本鬼子的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当时作为日寇重点进攻的山东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人民期待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美好的家园。为了尽快展开战后的重建工作，解脱广大青年特别是妇女干部的后顾之忧，同时也为了妥善解决战争期间寄养在老百姓家中的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的问题，山东省政府及党组织决定由省妇联倡办建立一个托儿所。

1945年9月30日，山东省第二届妇救会在临沂城的文庙召开，10月13日闭幕。这次会议改称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为山东省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选举我母亲刘锦如为省妇联主任，祁青若、王月村为副主任。因此成立托儿所的任务是我母亲上任之后面临的第一件重要工作，随即便开始了紧张的筹备。11月由三个保育员、五个幼小的孩子坐着两辆胶轮大车离开了省政府机关所在地临沂城，来到了沂河东岸的一个宁静的村庄独树头，成立了山东省立托儿所，首任所长叫李明。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由我奶娘刘烈带着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艾鲁沂、艾鲁生来到了这个托儿所，由于他们俩都是刚从各自的奶爹、奶娘家里接出来，开始很不习惯托儿所的生活，整天哭着闹着要回家，不过三四岁的孩子很快就对这里无忧无虑的愉快生活适应

了。应该说这段生活是我们这些孩子有生以来所渡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在当时都是最好的。并且经常有一些外国人来参观，每当这时阿姨就会让我们排好队和他们一起照相，之后就会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东西送来，比如美国奶粉、饼干、又大又厚的巧克力及被褥、衣物等等，至今我都还有较深的记忆。这一切对我这个当时只有五六岁的孩子来说并不知道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了解、知道了这段历史的真相。

1945年8月，我们虽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蒋介石为了独霸抗战的胜利果实，不断向我解放区进攻。随着解放区自卫作战的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

不得不由原来赤裸裸地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改为以“中立”的面目出现进行“调处”，以便赢得时间帮助蒋介石部署兵力消灭共产党和解放军。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和我们签订了《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代表参加的“三人委员会”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三方人员组成的“三人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执行调处任务。《停战协定》签订后，联合国善后救济署本着“不分政治、不分地区，救济受灾人民和恢复善后工作”的原则，派官员抵达临沂与山东省政府、省参议会、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山东分会，协商向山东解放区发放救济物品事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救济物资能很快送到我们托儿所，并经常有外国人来我们托儿所和我们一起照相的历史背景。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我解放区。我们这个刚刚成立了半年多的托儿所，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结束了我们短暂而幸福的美好生活，被迫离开了独树头，踏上了颠沛流离、艰难困苦地从山东到东北的万里大转移，直到1948年春天从东北回到了山东，历时两年十个月。

直到1948年春天从东北回到了山东，历时两年十个月。

这组托儿所的照片拍摄时间是1946年1月到6月之间，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是国共调处期间，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官员到托儿所参观、考察是属于正常工作。

“照片1”“照片2”的拍摄者不详，“照片3”的拍摄者是杨玲同志（康矛召的爱人），她当时是新华社华东前线唯一的女摄影记者。



前排左一朱青（我方翻译），右二艾鲁生（我三弟弟）；滑梯上前排左一艾鲁林，左二魏晓路（魏文伯之女），左三杨柏玲（朱则民之女）；滑梯上后排左二杨柏青（朱则民之女）。



前排右二艾鲁林，右三魏晓路（魏文伯之女），右六艾鲁沂（我大弟弟）；二排左一刘锦如（我母亲），右四朱青（我方翻译）。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 (下)

赵 炯

为了坚持货币斗争的基本方针，保证斗争的胜利，各级组织切实把握了以下几个基本点：

1. “排法”“禁伪”，尽快完成单一货币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消除根据地的经济危机。

2. 坚持保持币值，稳定物价的基本货币政策。根据地的本币既不同金银保持一定联系，也不同法币伪钞保持一定联系，而是同物价联系，把若干种重要商品的物价指数作为决定本币币值高低的标准。

3. 掌控外汇，压缩伪钞，扩大本币流通范围。外汇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本币币值，从而引起根据地物价的变动，特别是进出口物价的变动。因此在



北海银行印钞厂一角

外汇管理中要掌握伪钞变动的规律。压低伪钞币值，目的在于保护本币，使其不至于受伪钞跌落的影响。这只能用本币对伪钞的优势扩大本币流通范围，压缩伪钞流通范围，使其通胀加剧。1944年春伪币发行量为53亿元，到年底，即猛增至182亿元，加之流通范围缩小，币值大跌。

4. 货币的最基本保证是物资，敌我货币斗争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物资。根据地的货币政策是一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增值物资，充实货币基础；另一部分用于掌控粮、棉、布、花生油等重要物资作为本币的准备基金，此项基金一般占发行量的半数。

配合货币斗争，山东抗日根据地采取了两项有力措施：

（一）加强金融管理，促进经济发展

积极开展银行业务，扩大业务范围，除原有的借贷外，又开展了储蓄、汇兑、投资等业务。1942年前贷款的主要用途是救灾，以后加强了管理，增加了数量，扩大了范围，主要用途转向支援农业生产、扶持手工纺织业，大力发展生产，同时也投资工业、商贸。1942年，北海银行仅在鲁中、鲁南、胶东、清河就发放贷款938万元，其中农贷438万元，占51.5%；工贷441万元，占47%。1943年，仅春耕贷款就发放580万元。1942年，北海银行仅向鲁南、沂蒙两区就发放纺织贷款10万元。滨海区在贷款的扶持下生产出总值达420万元的棉布。1943年本币用途，农贷占25.41%；工贷占12.25%；合作贸易贷款占10.43%；信贷占6.52%，可见银行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地有了坚实的物资基础。总之，到1943年，北海银行已基本建立起独立的组织系统，取得了对敌货币斗争的初步胜利，根据地基本建立起本币市场。

（二）统制对外贸易，实行以货易货，严禁粮棉资敌

在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的统一领导下，各地都开展了积极地对敌经济斗争。1942年末，鲁中联合办事处就作出制止粮食资敌、对敌开展粮食战的决定；各地政府、民兵、税收贸易机关严格缉私贩粮食运往敌占区者，查获一律没收；粮食10斤以下者，可自由买卖，10斤以上者，须向村长、农救会长领取购买证，无证者视情况予以处理；没收的粮食一律交粮食部门，不得私自处理。一般民兵、民众，提奖三成，部队机关提奖一成。商业用粮，须向政府领取购粮证。每区成立两处粮食交易所，一切粮食买卖，均须经过交易所。由敌占区大量运粮来根据地者，政府予以保护、奖励。

沂蒙专署制定严禁棉花出境办法：指定5处集市为棉花交易集市，其他集市不得销售；对不产棉区，由政府指定合作社运销调剂。无纺织局证明而运销5斤以上棉花之边缘区者，查处没收，严重者，从严惩处。

敌人也出新招。在夏收前，以2亿元伪钞办理“官仓”“组合”“配给”，并向根据地倾销。针对敌人的阴谋，根据地一方面动员群众自己粮自己藏，反对交到公仓：种什么吃什么，反对不合理的粮食配给；自己的粮食自己处理，有权自由买卖，同时动员敌占区的群众不交、少交、晚交。另一方面先后拨款4756439元购买粮食，粉碎了敌人利用“官仓”“公库”掠夺粮食的阴谋，根据地初步建立起经济封锁线。

三、货币斗争的最后一战

日寇投降后，武装斗争暂时停息，但货币战争并未结束。由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当时在山东形成了三种货币市场。一、解放区（原根据地）的北海币（本币）市场；二、新解放区的北海币与伪钞混合市场；三、国民党收复区的法币和伪

钞混合市场。通过抗战时的货币斗争，北海币市场已非常巩固，流通量不断扩大。国民党自知法币在山东难以和北海币抗衡，为了给法币流通创造条件，采取支持伪钞与北海币抗衡的办法。解放区迅速扩大，已使各战略区连成一片，但北海币的流通量与社会容量尚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北海币与法币、伪钞的斗争日趋激烈。这场斗争对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有着重要影响，能否取胜，直接关系到解放区的安危。

为了取得这场货币战争的胜利，三方各显神通。

国民党深知法币在山东市场不大，不惜使出支持伪钞抗衡北海币的卑劣手段，公然同敌伪合流，以期达到占领收复区市场的目的。

日寇害怕其大批物资存货被没收，一是想方设法拖延投降时间；二是收缩伪钞，平抑物价，稳定人心；三是大量廉价抛售存货。一般商人因银行抽回贷款，也被迫抛售存货。就这样，法币、伪钞市场在敌人的操控下，迅速发生变化，由日寇投降时的一路狂跌，转而企稳回涨，与北海币的比价由一分涨到一、二角，法币也由五分涨到二、三角，尚未解放的城市物价有所回落。

伪钞回涨的反常现象，虽然可使敌占城市的物价暂时稳定，但代价甚巨，是靠大量物资来回笼伪钞，无异于饮鸩止渴。物价虽低落，城市却空虚，实难长久维持。针对这种情况，解放区决定将计就计，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来个草船借箭，组织群众排挤伪钞，吸收物资，加强对敌占城市的封锁，从而达到巩固北海币的目的。

1945年9月13日山东省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各地采取以下对策：1.新解放区迅速发行本币，排挤法币、伪钞，不准市面流通；2.低价收兑法币、伪钞；3.利用敌伪抛售存货的机会，大量吸收物资；4.继续坚持对敌占区粮、棉、煤炭等物资的封锁；5.稳定解放区的物价，防止因敌占区物价变化而引起解放区的物价波动。

这次斗争由于领导得力，判断正确、方法灵活得当、行动迅速及时，不仅把几十亿的伪钞迅速排挤出去，使人民免受伪钞狂跌可能蒙受的损失，而且扩大了北海币的市场，巩固了本币的地位，支持了新解放区财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四、货币斗争的主要成就

1.停用法币、禁用伪钞的成功，使根据地绝大部分地区成为本币的一统市场。

1943年至少有6亿法币被排挤出根据地，换回了大量根据地军需民用的各种物资。到1945年，又将几十亿的伪钞从新解放区排挤出去，基本实现了“排法”“禁伪”的任务。仅鲁中区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就将9000万至1亿元的法币杂钞排出根据地市场，彻底改变了本币只流通于南至沂南张庄、北至蒙阴坦埠狭小区域的状况。随着流通范围的扩大，本币的发行量也由2亿增至6亿，到1945年本币发行量已达10亿，市场流通量已达7亿。到1944年6月，滨海、鲁中、鲁南三大战略区已逐步实现了本币统一发行。

2.本币比值升高，法币、伪钞比值跌落。1943年7月停用法币前，本币法币等价交换；与伪钞须7~8元兑换其1元。到12月，本币1元即可兑换法币5元。到1944年底，伪钞1元仅相当于本币0.15元；法币1元，仅相当于本币4~5分。到1945年7月，本币1元相当于伪钞15~20元；法币绝迹。本币币值的提高，在游击区和敌占区也建立起巩固的地位。鲁南敌占区1944年12月，伪钞5元兑换本币1元。费县早上棉花每斤伪钞120元，中午就涨到150元。盐早上每斤伪钞2~3元，中午就涨到6元。

3.物价基本稳定，市场渐趋繁荣。货币斗争的胜利，使本币摆脱了法币、伪钞

涨跌的影响，单独保持着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如以1936年法币的指数为100，1942年则到了965，1943年则升到4700，1944年则攀至28000。伪联币1944年1月~1945年1月就涨了8倍。与此相反，本币自脱离法币后，物价不但没涨反而下落了30~40%。货币斗争的胜利，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集贸市场繁荣。鲁中区坦埠集在国民党盘踞时，赶集人数不超过5000，交易额10万元左右，货币斗争胜利后，赶集人数超过2万，交易额达3000万元。

4. 投资生产建设，充实对敌货币斗争基金。本币的发行，主要用于工商基金，其次为农业贷款。到1944年底，本币发行量约为4.7亿元，工商资金总数为2.4亿元，占发行量的半数。到1945年1月，北海币发行量为10亿元，仍以半数作为工商管理资金。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 (二)

赵丹峰

南宋，在婺源朱氏一族中，走出了两位名垂史册的贤达名士，一位是著名爱国名臣和文学家朱弁，另一位是一代理学宗师和杰出教育家朱熹。二人在班辈传承上是祖孙关系。祖孙二人皆因其突出的建树与懿德，成为历代万千朱氏族人为人处世的效法典范和引以为傲的族群徽帜。朱弁系徽州（原名歙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字少章，号观如居士。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冬，高宗计议遣使赴金，去问候被羁押于金国的徽、钦二帝，在当时的形势下，出使金国风险颇大，朝臣多对此差事生畏。而身为太学生的朱弁却不计个人安危，自荐请命赴金。高宗遂先授其为候补修武郎、右武大夫、吉州团练使，而后再下诏其为河东大金军前通问副使，于翌年正月与王伦一同出使金国。二人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市），见金军统帅粘罕，即被粘罕派兵羁扣于驿馆。5年后，金主出于当时时局变化情况，提出要与宋朝议和，并允许来使中有一人可南归禀告高宗。朱弁即推让王伦返朝，王伦问其故，朱弁泰然答道：“吾既来金，即准备以死报效朝廷，焉能侥幸先回！”他要王伦将图印留下，言道：“印即信也，愿报印以守节，死不离矣。”王伦走后，金人威逼朱弁投降由金所扶持的伪齐刘豫，朱弁慷慨道：“豫乃国贼也，吾恨不食其肉，怎会降附此贼！”金人见劝降无果，遂断其饮食。朱弁忍饥待尽，誓不屈从。金人亦为其精神所感动，遂致礼如初。金人见不能压服，便以官职相诱。朱弁正色道：“自古交兵，使者处于其间，言如可从则从之，如不可从则囚之、杀之，何必易其官。吾乃大宋之臣，若叫吾留金为官，今日只有一死而已！”一日，他具酒食，将靖康之变后被掠至金国做人质的数位宋朝官员邀



至驿馆饮叙。半酣，乃对众人道：“吾已看好近郊某寺地，一旦为国死节后，烦请诸公将吾埋葬于此，在墓碑上题上‘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字样。如此，我在地下也感到欣慰矣！”众人闻其所言后，皆低头泣哭，莫能仰视。朱弁见状乃谈笑自若道：“守气节视死如归，乃臣子之常，诸君何必悲戚！”金人闻知后，知其心志已不可撼动，遂不再强逼。在羁留金国后期，金人对朱弁的看守稍显宽松，不少金国王公大臣慕其学问，多遣其子弟到朱弁处求学。朱弁便利用这一机会，在教育金人子弟学识的同时，向他们灌输两国和好之利。后粘罕等主战派将领相继病死，朱弁便将金国内部的变化情况及金国虚实秘写于纸，遣李发等行返宋禀报，并告知南宋朝廷：“这是我们收复失地不可错失的有利时机。”后王伦复归时，将朱弁撰写的奉送徽宗大行之文带回呈给高宗，当高宗读至“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数句时，一时竟感泣失声。高宗曾对丞相张浚说：“待朱弁归来时，当授以禁林（指在皇帝身边处理中枢要政的近臣）之职，以佐朝政。”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金议和成功，被羁留金国16个春秋的朱弁方得以回归宋朝。高宗感其气节，诏褒其“忠义守节”。有司校提议，朱弁十六载守节不屈，矢志不移，朝野无不为之感佩，以功应晋升数级，但因奸相秦桧极力阻挠，最后只授朱弁奉议郎一职。翌年四月，朱弁病逝。后，其侄孙朱熹撰《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记述其祖朱弁事迹颇详，为《宋史》主传所本。

作为南宋初期的重要诗人，朱弁在被羁留金国期间，写了不少怀念故国的诗章，元好问《中州集》收其诗计38首，这些诗作，内容多反映囚徒生活，感情真挚，风格缠绵，颇为动人，《寒食》《春阴》《送春》等是其代表作。如《春阴》写道：“关河迢递绕黄沙，惨惨阴风塞柳斜。花带露寒无戏蝶，草连云暗有藏鸦。诗穷莫写愁如海，酒薄难将梦到家。绝域东风竟何事？只应催我鬓边华！”该诗抒发了作者被拘异国，对故国家山望眼欲穿的殷殷深情。再如《寒食》中的“绝域年华久，衰颜泪点新。每逢寒食节，频梦故乡春”和《送春》中的“结就客愁云片断，唤回乡梦雨霏微”等句，均是作者思念故国心情的真实写照。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考亭，世称朱子。朱熹系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中进士时年仅19岁。他为官时久，历任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先后任泉州同安主簿（相当于现今的政府秘书长一职）、知南康军（宋代军与州、府同级）、宝文阁侍讲（即宁宗的老师）和秘阁修撰等职。卒谥文，追封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此后国人皆以朱文公或朱子称之。在政治上，朱熹力主抗金，反对苟全；在学术上，曾师事李侗，为二程（程颢、程颐）四传弟子。他博极群书，广注典籍，在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均有重要建树，所涉门类之广和精度之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言其建树广博，但最为突出者，还主要体现在思想学术和兴教育人这两大方面。

先看他在思想学术领域的巨大建树：众所周知，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删定六经，历代相沿，形成经学。客观地说，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主要的内容是为政之术和修身处世之道，其蕴含的哲学思想是相对贫乏的。自唐代始，儒学的传统受到了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挑战，宋代以降，这一趋势愈加明显，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均信仰佛教。另一方面，宋代是经济特别是商贸活动相对繁荣发展的时代，《清明上河图》即是当时商品经济繁荣鼎盛的一个缩影。商业的繁荣使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传统的儒学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叫“信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思想巨人如周敦颐、二程相继担起了重建新儒学的历史责任，为理学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到了朱熹，为了迎接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挑战，他更是以将传统儒学从旧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己任，

在继承前人特别是程颐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经过创新、发展，最终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将传统儒家学说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世称程朱理学，亦称朱子学或闽学。朱熹本人也成为影响中国600余年的一代理学宗师，是继孔孟之后，中华传统主体文化的主要代表性人物。

在哲学上，朱熹继承二程，将“理”作为其哲学理论的基础。他认为“理”是产生物质世界的根本，“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理在先，气在后”。他把一理和万理看作为“一理分殊”的关系。提出“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指出事物“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熹深化了张载的“两故化”说，认为阴阳“交感”化生万物，进而指出二者不是并立的，总有一方处于“胜”的地位，“非阴胜阳，即阳胜阴，无物不然，无时不然”。在知行问题上，他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又认为“知行相需”，强调行在认识中的重要性，所谓“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他的上述观点，闪耀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在人性问题上，他认为“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宋代理学家所说的“天理”，实质上即“仁、义、礼、智”的纲常伦理；而“人欲”则是指人们的生活欲望。朱熹认为，由于禀气不同，所以有圣、贤、愚、不肖之分，从而产生人性之善恶。去人欲宛如除去蒙在宝珠上面的污秽，使“宝珠依旧自明”。因此，必须克去私欲才能尽性穷理，从而使“天理常明”，使社会和人的人际关系（包括家族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保持以“仁、义、礼、智”纲常为规矩、秩序的和谐状态。可以说，“穷理”与“克欲”构成了朱熹全部学说的核心内涵，贯穿于他对经学的注疏和讲解之中。

朱熹在著《四书集注》时，采择理学家中与己意相同的论说，运用较为通俗浅近的文字表述方式，对《四书》进行注释，从而使他的理学观点借四书而得以广泛传播。再如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朱熹著《小学集注》。他将古籍中有关三纲五常的礼教之论择合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4卷，作为该集注的《内篇》；又取古近人的嘉言、善行合为两卷，作为集注的《外篇》，共计6卷。在注释时，朱熹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教育青少年要遵照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由于言简意明，通俗疏朗，从而使朱子学说在当时和日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成为此后中国封建社会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支柱。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者注意，即宋代的理学家均以反佛为己任，但朱熹在这一点上却与他们有明显的区别。他虽然讳言佛学（其实他在年轻时一度信奉佛教），但他的学说却吸收了佛教禅宗与道教的理论，从而使他所创建的理学平添了更多的哲学色彩。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这是朱熹之所以成为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还要强调指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极为重视宗法伦理的传播与普及，尤其关注家族、家庭在构建社会伦理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之前，普通百姓由于其社会地位的卑下，是不能立祠祭拜祖先的。后经朱熹等南宋理学家的倡议，平民百姓也可以在村中创立宗祠（多以一个族群为单元），用于祭祀先祖，慎终追远，这就开了中国民间设祠祭祖的先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座落于广大乡村的族祠，除了祭祀祖先外，已逐渐成为议决族中大事，如开设义庄、创办义学、族人捐资助贫等的重要场所，并涉及到族人间突出纠纷的调解等。这一族群自治（中国的乡村绝大多数是聚族而居）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完善，在维护传统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睦状态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朱熹的另一个杰出贡献是在兴教育人方面。通晓古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书院制度是有别于官学的重要的封建教育制度。书院兴起于晚唐，鼎盛于宋代。当时不同层次的书院遍及全国，其中，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嵩山的嵩

阳书院和商丘的应天府书院被誉为中国的四大书院。居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就是由朱熹亲自创办的。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处，其前身系南唐时的庐山学馆，后废。朱熹在49岁时奉旨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省星子县），在此主政时，他为了培养人才，在原庐山学馆旧址上兴建了闻名全国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属当时国内书院中层次最高者，相当于今天的重点大学。作为军（与郡、州同级）之主官，他不顾政务繁忙，不仅亲任洞主（即院长），还亲撰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此揭示在国内影响极大，被奉为国家办学之纲领。由朱熹制定的白鹿书院学规，体现了朱熹的办学理念与教育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一曰“五教之目”。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二曰“为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三曰“修身之要”。即“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曰“处事之要”。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五曰“接物之要”。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学规后传至日本，为东瀛学界所效法。朱熹不但制定办学方针和规范，而且于百忙之中亲自登坛授课，为培养治国弘儒之才呕心沥血。之后，朱熹又履职长沙，其间，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修复了岳麓书院。该书院鼎盛时有学生2000余人，朱熹亦时常到书院讲学。坐落于江西铅山县境鹅湖山北麓的鹅湖书院亦是朱熹的治学之所。1175年和1188年，驰名于中国哲学史上的两次“鹅湖一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朱熹著述宏富，主要著述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太极图说解》《诗集传》《楚辞集注》《孝经刊误》等。另有《朱子语类》140卷，《朱文公文集》100卷等，总字数达2000万字以上。和古代其他思想家不同，朱熹在做学问时，还对自然界的变化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如关于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说；如通过高山上残留的螺贝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洋）等。韩国国立汉城大学的一位终身教授写了一部名为《朱子自然哲学》的专著，对朱熹对自然科学的论述作了集中记



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朱熹还通晓音律，宋代官方乐队五音的定调即由朱熹予以定夺。朱熹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虽诗篇数量不多，但几乎皆为精品。如《观书有感》（二首）其中之一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者将方塘比心，水比知识，通过写景而寓读书心得，以形象来喻哲理，可谓独具匠心，意味无穷。再如《春日》写道：“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风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春游诗语言明快，写景传神，读之令人赏心悦目。以上两首诗皆被誉为古诗之名篇，被后世广为传诵。

朱熹登第五十春秋，历仕四帝，可谓“四朝元老”，但一生既未做高官，更无厚禄可取，两袖清风，家境贫寒。因执着宣扬道统理学，为宁宗及朝中一些大臣所厌，将道学指责成伪学。庆元元年（1195年），宁宗下旨，将朱熹落职，其门徒蔡元定被充军道州编管。两年后，宁宗又下诏，订立伪学逆党籍，共59人受株连，其中包括赵汝愚（本身系皇族）等4名宰相。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卒。5年后，理宗赵昀即位。理宗在登基前即崇拜理学，即位后即习读朱熹注释的四书。宝庆三年（1227年），理宗召见朱熹之子朱在，称自己对朱熹注解的四书“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下诏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后又改封为徽国公，并把朱熹列入孔庙，与孔子一同享受祭祀。程朱理学（亦称道学）从此便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统治思想的正统和宋代以后儒学发展的代表。清代，康熙、乾隆两帝均对朱子理学推崇备至，在谈及读书对自己的受益时，乾隆曾感慨道：吾读书50余年，只认识一个朱子。朱熹至此成为皇帝推崇的圣人。朱熹的思想在日本和朝鲜半岛均有重大影响，如日本在江户时代，举国上下即推崇、流行“朱子学”。至今，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仍有不少学者热衷于对“朱子学”的研究与传播。如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在立国后，便在其开国总理李光耀的倡导下，几十年如一日奉行以儒家思想治国理政，并将朱熹所论述和提倡的“君臣有义，父子有爱，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价值观，与工业信息化社会的需求相统一，成功地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使该国无论在社会经济发展、道德教育、文化建设、廉政建设等诸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成为公认的现代东方文化建设的典范。新加坡等国的经验表明，朱熹的儒学体系与理念，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对我们所推行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践行，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作用。“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华古文化，泰山与武夷”。两位睿智的圣人，两座巍峨的文化高峰，他们所创建的儒学体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与根系。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从这一文化母体中汲取赖以“健身强体”的智慧和乳汁。

元代，朱世杰和朱丹溪分别以数学和医学方面的突出建树而名闻遐迩。朱世杰系元初杰出的数学家。他与宋末的秦九韶和杨辉，金末的李冶一起被誉为金元数学界四大家。朱世杰是一位数学教习，周游湖海20余年。著有《算学启蒙》3卷和《四元玉鉴》3卷。前者包括了从乘除及其捷算法到增乘开方法、天元术各方面的内容；而《四元玉鉴》则是朱世杰的呕心沥血之作，代表了中国古代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该书对他发明的四元术和各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方法，作了科学的阐述与总结。四元术以天地人物表示四个未知数，其计算方法采用四元消法，把四个元经过剔消，最后剩下一个元，这个元如不是天元，可以易位。然后用天元术的解法，求得答案。该书一篇序文云：“上升下降，左右进退。互通变化，乘除往来。用假象真，以虚问实。错综正负，分成四式。”在我国古代数学中明确提出数学“用假象真，以虚问实”的理论，此系第一次。朱世杰发明的多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方法，

在古代称之为垛积术。以茭草垛（即一加二加三加四……）为母垛，推演出各种不同方式的垛而求其积。其推演的结果与推导的公式均极准确。他的研究成果与运算方法，不仅在中国独树一帜，就是在世界上亦属最先进之列，朱世杰因此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数学家之一。

朱丹溪是医学领域有重要成就者。朱丹溪，名震亨，字彦修，因其家乡义乌有水名丹溪，故时人称其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他系元代著名医学家，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之一。青少年时一度专研理学，30岁时为治疗母病转而学医。为熟悉医道，他走遍江、浙、皖各地访求名医，后从师于杭州名医罗知悌。罗知悌授以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三家学说，并向其传授《内经》意旨。他在继承罗氏之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结合自己的行医实践，敢于突破前人，创论疾病多由“阳有余而阴不足”所致，认为人体虽有赖于“相火”以温养脏腑，但“相火”又易引致耗伤经血，故而在临床上应注重滋阴降火。他因此被后世称为滋阴派代表。由他所创制的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时至今日仍在流传应用。他针对当时一些医家忽视辩证施治，机械地搬用北宋的《和剂局方》的做法，特著《局方发挥》，对北宋局方和时人的不妥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和剂局方》的不足在于按经验办事，忽视了环境的变化及对疾病生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等客观因素，由于墨守成规，“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所以势必会在诊疗和成效上发生问题。为此，他主张在临床上应辩证制方，善用滋阴降火之药。门人根据其行医经验整理编纂的《丹溪心法》，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另外，他还著有《格致余论》《素问纠略》《本草衍义补遗》等著作。朱丹溪的另一贡献，是由他亲手培养了一批日后享誉医学界的知名弟子，如戴原礼、赵良仁、王履等，他们均在悬壶济世、发扬光大朱氏医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丁守存和《编年自记》^(中)

丁兆铭

《编年自记》原文

道光十五年，乙未，二十四岁。

正月，以小车载行李，跋履登程。过沂郡，见东严师。松屏师已调冠县，迂道往。各有赠资。与闽中刘建庚、建韶昆季^[59]同行。至都，入闱。榜发，中式六十一名。书本不工又病后手颤，三试皆低。及引见单下，则先硃卷^[60]而后尖者，签^[61]得户部陕西司。费用种种皆松屏师及辛卯座师徐柳臣夫子、房师嵩峻亭夫子所赠。寓教场胡同会馆^[62]中，卖文为活，渐以秋俸自给。

冬初，先父母携妻小来都，租居宣武门外北柳巷小房。是科，座主穆鹤舫协揆，何仙槎尚书，文孔修都宪，张小轩侍郎，第八房师谌葆初夫子，讳厚光，丙戌检讨，贵州人。

道光十六年，丙申，二十五岁。



涛雄一角

仍寓北柳巷。间一二日一赴署而已。暇仍读书，多有问业者。

是年，以覃^[63]恩封父奉直大夫^[64]，母宜人，祖妣如之。

道光十七年，丁酉，二十六岁。

移居绳匠胡同南头路西。充本科顺天乡试外簾膳录官。出闈后，先父已染时疫，医治罔效，竟于九月十三日酉时弃养^[65]。

十月，奉母扶柩回里，贫窘异常，家无余粮，暂浮厝^[66]于村东园内。

道光十八年，戊戌，二十七岁。

郡尊熊东岩师延主琅琊书院，岁修二百金，从学住院生童^[67]八十余人。

道光十九年，己亥，二十八岁。

仍主琅琊书院。复以同部司友法可弇（良）致函河南中丞桂燕山，得鹿邑书院干修^[68]藉助薪水。

是年四月，葬先父于聚奎山之阳^[69]、太高祖母李孺人墓侧，遵遗命也。

十二月十三日，服阙^[70]。呈报。

道光二十年，庚子，二十九岁。

正月起复北上。

二月到都，暂居大井胡同小房。

四月，先母率家属到京，移山西街路东。仍以陕西司兼浙江司行走。

是年，奏留候补帮办陕西司主稿。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三十岁。

移绳匠胡同北头路东。

是年冬月，以海氛不靖，华阳相国卓海帆（秉恬）面奏，奉军机大臣穆鹤舫、师相祁春甫尚书传旨，命进方略。缮录图说进呈，二次均蒙留中^[71]。诏问“是否愿赴浙粤军营。”以亲母病，辞，不往。

是年，恭遇覃恩，赠先父奉政大夫，母秦氏太宜人，并驰赠祖妣如之。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三十一岁。

五月，奉旨：“工部尚书赛尚阿^[72]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查办事件，户部主事丁守存一并驰驿前往，钦此。”赏内府广储司银三十两。

于六月六日同理藩院郎中文康、户部郎中徐有壬等前往天津，监造地雷、火机等器。

九月回京，派捐纳^[73]房差，充陕西司正主稿。移寓教场二条胡同路西。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三十二岁。

四月，考取军机章京^[74]，奉旨记名。

是年九月，次女鹞年生。留上鬓。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三十三岁。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三十四岁。

四月，以洋磁水点药，误伤手目，月余始平复。捐纳房差满。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三十五岁。

移居西河沿路南。充则例馆纂修。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三十六岁。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三十七岁。

叔母安氏卒于籍，无嗣。移寓香炉营四条胡同。子凤年回东应童试，入日照县学第一名，为授室苏氏。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三十八岁。

闰四月补山西司主事缺。次子麒年生。

五月初二日，传补军机章京，十二日，奉硃笔点充广西副考官，与孙太史藻田（锵鸣）偕往。

八月初二日，至桂林。初六日入闱。首题《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次题《舟车所至》，三题《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诗题《千厓秋气高》得“高”字。八房分校，荐六百余卷，昕夕校阅，得士如额。揭晓后，正榜周冠等四十五人，副榜刘启正等九人。

十一月二十六日，回京复命，召对于圆明园。奉三无私^[75]，天恩优渥，温语久之。询出身、履历、地方情形甚悉。

是年为子凤年纳例贡，应顺天乡试。

道光三十年，庚戌，三十九岁。

正月十四日，宣宗成皇帝龙驭上宾^[76]，随扈^[77]西陵，加一级随带。

文宗御极^[78]。覃恩晋先父朝议大夫，母太恭人，祖妣如之。

咸丰元年，辛亥，四十岁。

正月，长女鹑年适常州费耕亭（己卯会元、福建粮道）之子费学曾（时以州判候补北河）。

四月，奉旨随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前赴广西办理军务。四月初九日，以员外郎缺拟陪引荐后启行。

六月初五日至桂林。专办营务摺奏。

九月，移营阳朔。

十二月杪。移营永安州，与贼相距三里许。

十月，力保已革提督向荣^[79]总北路军。连得大捷，直逼城下。

咸丰二年，壬子，四十一岁。

二月，以老母病请。差槛^[80]送首逆洪大全^[81]进京。出营之日。四镇追贼于永安东山，同时阵亡冒险行。贼以众来追，每日相去半程五六十里，连夜抵桂林。过全州，改用小舟潜行，石触舟坏，衣囊漂失。

四月十五日，到京，销差。

五月初二日，引见。升补江西司员外，仍在军机处行走。

是年，长孙保官生。

咸丰三年，癸丑，四十二岁。

二月，贼陷金陵、镇江、扬州。东省逼迓，土匪肆起。户部尚书孙瑞珍片奏保荐，奉旨暂行回原籍办理团练^[82]。

三月三日，出京由济南旋里。

五月，老母率家属旋里。新居甫定。赴沂郡督办团防。禀请中丞奏明，劝捐职衔集资办理。奉部议允，爰设局于琅琊书院。募勇壮，制大小礮位、石礮、刀矛等件。时值大饥。捐资收养弃孩百余，全活者九十六口。

六月，以劝团路经莒境南偏黑市地方，雨后车覆，伤右股，断骨。以药续之，数月始痊。

八月，见《邸抄》^[83]知为副都御史富兴阿所劾。奉旨：“以随同赛尚阿出差，致招物议^[84]，必有自取之咎，著撤退军机章京等。因钦此。”

九月，奉母命，以本支弟守任承先叔嗣。自出宦资，置产为葬祭、养贍之用。冬月，叔母安葬。初，胞叔歿时，有妾姜氏，以家贫，令去。后闻生有遗腹子，会议往抱，亦以贫故，且已立嗣，未果。悔继后屡访不得。因另立嗣安葬。

咸丰四年，甲寅，四十三岁。

二月，海州土匪陈玉标、朱广田等千余人，七日之间，扰及兰郯沂莒^[85]四县。当

即会同文武，带兵练败之于江南境之欢墩埠。巡抚崇恩^[86]具奏，奉旨交部议叙^[87]。

八月，擢升礼部精膳司郎中缺。次孙叙官生。

咸丰五年，乙卯，四十四岁。

四月，适常州。费室长女鹄年以产殁^[88]。遗外孙念慈。

冬，以倡捐账务，议叙双月道员。

十二月，次子麒年以痘殁^[89]。又殁一幼女。老母病剧。

咸丰六年，丙辰，四十五岁。

二月，两幼孙以痘后出疹，六日并殁。

三月初七日，先母忧患终天。合葬聚奎山之阳^[90]。百日后，稟请东抚^[91]，奏销团练差。在籍守制^[92]。

咸丰七年，丁巳，四十六岁。

在籍授子侄读。

八月，赴常州，至费学曾家，又至苏州。

咸丰八年，戊午，四十七岁。

六月服闋。

七月至省。巡抚崇恩具奏团练得力，请旨交部，声明劳绩。

引见，得旨：谕允十月十四日，吏部具摺带领引见。奉旨，“以道员用。”交部议叙。

十六日，具摺谢恩，蒙召对四刻有余，垂询甚悉。并将乙巳年手目因制洋药受伤奏对，上注目久之，天恩优渥。十七日，奉特旨：“发往直隶，交庆祺差委。”

十八日，具摺谢恩，复蒙召对六刻有余，自巳正二刻跪至午正。上闻自鸣钟十二点，回视又将一刻，始命下。询问平日著作，令缮，具呈。览及从前粤西军情，并火器、防守、战伏、洋器各式制法、兵书、天文、算法等事。谕：“汝往天津，看所办，如有不妥，即为好好预备”等语。

十一月初九日，到保省，见庆制军。二十五日，至天津海口。一一具稟制军，甚为嘉奖。

咸丰九年，己未，四十八岁。

二月，庆制军到津，同至海口。派总理营务处，嘱令悉心筹画。时当事者，主战主抚，纷纷不一。予上书略云：“战之局在粤，抚之局在沪，津则只可言守。津门密迩京师，于此言战，是背城之举也，小挫固伤国体，幸胜亦非长策；于此言抚，是城下之盟也，如其愿，则溪壑难盈，拂其意，则仓卒生变。”云云。爰^[93]将后路防守。亲乘小舟，遍行查看，绘图注说，并将平日所著，缮一摺呈请附奏。制军极为允可，并备摺稿面云：“汝系特简人员，无须奏留，亦不俟劳绩，当为奏明，应如何录用，出自圣裁。一俟回津，即行缮发。”诒^[94]数日之内，于途次一病不起，前功尽弃矣。署督文煜事权不属；新督恒福到任已迟，无及，且于津防事一倖僧邸^[95]，不敢参一语。

四月，派令赴京，会同内务府查看旗租^[96]地亩。

五月，夷人来，我军倖胜；相贺。予独深以为忧。

九月以僧邸恂恂^[97]恒制军保奏，前赴大顺广^[98]三府督办团防。

十月，至大名，周历二十六属，亲为劝谕，刊战守十六条，以坚壁清野^[99]为主。惟长垣、开州、清丰、南乐尚知踊跃。劝成二十余处，并造自发火机、石礮等式。

岁暮回大名。是冬，次女鹄年适费县王兴麟之子庠生肇震。

咸丰十年，庚申，四十九岁。

五月，奉恒制军函，令移广平。旋闻天津夷务决裂。

八月，圣驾北巡，京师震动。

九月，以山东团练大臣户部侍郎杜乔羽六百里飞函请：“旋东带曹勇三千北援，业已入奏”等语。九月十二日到东。十五日奉朱批^[100]停止。并奉旨：“勿庸来东”等，因当即折回。而齐河县城已被土匪围困，不能进，折回济南。其时南信紧急，杜侍郎请留襄^[101]团务，一面出奏。当即回籍。二十七日，抵里，贼已至江南界之青口矣。去照不百里，火光烛天，爰疾驰归，招集乡团，自带亲随四十二人，扛大礮赴安东卫，住候补江苏知县苏升纪家，令各街大张灯火，扬言带京兵三千已到。贼闻之，于十月初一夜窜往西南沙河一带而去。十月奉到朱批，仍飭^[102]回直。并因接信未奉谕旨，交议。即欲遵旨驰回，而亲族耆老因乱坚留不放，因以资斧^[103]假，暂留共议固守之计。

《编年自记》注释

[59] 昆季：兄弟排行称昆季。

[60] 硃圈：用红色硃砂墨水圈定，特指皇帝御批。

[61] 签得：清制，没有取得实职等待候补的官吏，吏部根据缺员情况，集合候补者每月抽签一次，分发到某部或某省补缺。也可以通过捐钱免于抽签方式，自主选择指定到某处候补，称为指省或指分。

[62] 会馆：亦称“公所”。中国旧时都市中同乡或同业的封建性团体。名称最早见于明代，清代更盛行。一般以县府省为单位。在京师的大都是外地官员绅士所组织。近代有纯同乡性会馆，一般为同乡和同业内部的利益服务。

[63] 覃：深、大的意思。覃恩：专指皇帝特别恩赐的套语。

[64] 奉直大夫：散官名。宋代，为文臣寄禄官。大观二年（公元一一〇八年），以右朝议大夫改称。金、元、明、清各代为文散官。清代，为十六阶之第十阶，从五品。

[65] 弃养：是对长辈去世的委婉的讳饰修辞，意即放弃了子孙对他的侍养而离世。

[66] 浮厝：厝，放置，对死者暂不正式殡葬，寄放棺木或浅埋待葬叫浮厝。

[67] 住院生童：住在书院学习的学生。

[68] 干修：也叫“干薪”或“干俸”。旧时指官员不用亲身务工而是靠名誉、声望或某种名义关系而取得的薪水待遇。

[69] 阳：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水北为阳，水南为阴。

[70] 服阙：旧时官员父母去世，一般情况下要辞职回家守孝（制）三年，以表朝廷鼓励孝道，三年期满叫服阙。可由朝廷重新安排职务，或复原官，或调他职。如国家有特殊情况（如战争或某种特殊政治需要）不能离职守制尽孝的，可由皇帝特批守职而不回家，叫夺情。

[71] 留中：皇帝把臣下的奏章留于宫禁中，不交议也不批答。《史记·三王传》“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

[72] 赛尚阿：字鹤汀，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嘉庆十一年翻译举人，授理藩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曾任户部、理藩院、工部尚书。道光十一年，曾携僧格林沁赴天津查海防。咸丰元年，拜大学士，管理户部，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西督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同太平天国军作战不力，又因在湖南堵截不力，撤职逮京治罪。后出狱命其训练察哈尔蒙古兵。后授侍郎衔，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以病免。光

绪元年卒。

[73] 捐纳：中国旧时以授于官爵（虚衔或实职）取得捐款的办法，始于秦代。清乾隆十年，始有经常性捐纳。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库亏空，广开捐例，以增加皇家收入，京官自郎中以下职衔，外官自道台以下职衔，均可捐纳。因此捐纳盛行，官职明码标价成为商品，且捐纳名目繁多，如《海防捐例》《河工捐例》等，各捐项各有专门管理官员。

[74] 军机章京：清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设军机房。雍正十年（1732年），改称军机房为军机处。在军机处任职者无定员，最多时达六七人，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充任，称为军机大臣，通称大军机。任命时亦按各人资历分别称为军机处行走，大臣上行走等。其僚属称为军机章京，通称小军机，掌缮写谕旨，记录档案，查核奏议等工作。

[75] 三无私：《礼记·孔子闲居》：“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常用于对国君的阿谀奉承之辞，比喻绝对的公正无私。另有《吕氏春秋》“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四无私之说。

[76] 龙驭上宾：指皇帝驾崩，即死去。

[77] 随扈：“扈”同“护”。

[78] 御极：皇帝登基即位。

[79] 向荣：（1792—1856年）晚清将领。字欣然。四川大宁（今巫溪）人，寄籍甘肃固原（今属宁夏）。出身行伍，初隶固原提督，曾随陕甘总督杨遇春镇压河南滑县天理教李文成起义和新疆张格尔起事，由外委累升至游击。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调直隶（约今河北），官至总兵。1847年，擢四川提督。1850年，调任湖南提督，镇压新宁李沅发起义。同年秋，调任广西提督，参与镇压天地会等起义。1851年（清咸丰元年）1月，率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多次惨败后，被革去湖北提督职，留任钦差大臣，继续督办军务。旋以年老多病，忧忿而死，葬于湖北黄梅向桥乡枯树岭。有《向荣奏稿》传世。

[80] 槛：槛车，囚车。

[81] 洪大全：太平天国军师，封号天德王，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在广西被赛尚阿所部生获押解北京被害。洪多韬略，爱读书，善作诗词，曾有题扇言志诗：“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妄将金锁锁飞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82] 团练：团丁，团勇，民兵。清朝民团性质的武装，但为政府所用。

[83] 邸抄：清代中后期皇家所办的一种原始的报纸。

[84] 物议：众人的议论。《梁书·袁昂传》：“窃以一食微施，尚复投殒，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惟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南齐书·王俭传》：“少有宰相之志，物议咸相推评。”

[85] 临郯沂莒：临，临沂；郯，郯城；沂，沂水；莒，莒县。

[86] 崇恩：觉罗氏，字仰之，别号香南居士、敬翁、语铃道人，室名壶青阁、香南精舍、吾亦爱吾等。满洲正红旗人（一作正蓝旗），系满清皇室。活动于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先后任山东巡抚、内阁学士等，为道、咸朝重臣。工书，法苏轼。画山水，出入宋、元诸名家，撷其精华，故能超轶凡近。喜收藏、精鉴赏，收藏历代书画、古籍碑帖极富，是清代中晚期著名的书法家、收藏家、鉴赏家、金石学家、诗人。著有《香南居士集》《香南精舍金石契》《金石玉铭》《枕琴轩诗草》《崇雨舫中丞诗稿守岱集》等。



洮雄规划图

[87] 议叙：清制，于考核官吏以后，对成绩优秀者给以议叙，以示奖励。方法有二：一加级，二记录存档备提拔。又，由保举而任用之官亦称为议叙，如“议叙知县”之类。一般每月一次议叙，候补者则抽签决去处。下文双月道员应指连续两个月被议叙被推荐为侯缺道员。

[88] 殂：中年而亡。

[89] 殇：幼年而死或为国而死。

[90] 山之阳，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水北为阳，水南为阴。

[91] 东抚：山东巡抚。

[92] 守制：即守孝。古代规定，官员父母去世，可暂时离职卸任回家守孝三年，三年后叫服阙，可官复原位。如因公家特别需要，不能回家守孝的，叫“夺制”或“夺情”。

[93] 爰：才。

[94] 诘，不料，岂料。

[95] 僧邸：僧格林沁的衙门。时僧格林沁总理天津防守。

[96] 旗租地亩：旗人所占土地。

[97] 怂恿：此指授意，指使。

[98] 大顺广：大，指大名府；顺，指顺德府；广，指广平府。清时皆河北省州府。雍正十一年始三府合并升格为大顺广道，道府署设于大名。

[99] 坚壁清野：坚守营垒或据点，并将周围地区的粮食、牲口等重要物资转移或收藏起来，使入侵之敌不能掠夺和利用。

[100] 朱批：皇帝御批。

[101] 襄：助。

[102] 飭：命令。

[103] 资斧：亦作“齐斧”，本义为“利斧”；程颐解为资财，器用。后因称旅费、盘缠为“资斧”。《聊斋志异·竹青》：“家贫，下第归，资斧断绝。”

中哈边境线上的临沂老兵

——记魏德友

何 军 张晓龙



中哈边境新疆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黄昏，是一种空旷而孤寂的美。

当橙红色的日轮坠向辽阔的地平线，草原深处的凉意渐浓，黑夜张口吞噬大地，形影相吊的白杨昂首坚挺，流连淡淡的夕照。

踏着彩霞的余辉，从萨尔布拉克草原毗邻边境，一望无垠的草原只剩下了76岁的魏德友和他的100多只羊。这位守边了半个多世纪，有着32年党龄的老党员习惯了孤独的生活。

用木条插上了羊圈的门，魏德友回到自己居住的土房，一骨碌躺到了床上。门外羊圈里时不时传来一两声低吟。除此之外，草原寂寂，四野悄悄。

流动的岗哨

萨尔布拉克草原地势平缓，边境线缺少天然屏障。除了哨点的边防军队，护边员的巡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牧民们搬走后，草原变成了“无人区”，发生偷越境的概率相对较大。塔城裕民县边防大队政委叶尔那说。

魏德友是主动选择留下来的。过着“家住路尽头，放牧就是巡逻”的生活。

每天的清晨或傍晚，魏德友要来回走8公里的牧道去边境线，看有没有人员经过的痕迹，到牧民留下的房子查看情况。

半个多世纪来，魏德友义务巡边近20万公里，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堵截临界牲畜万余只，未发生1起涉外事件。

“这是我和战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要守到自己动不了的那一天。”魏德友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边境最危险的工作就是放牧。魏德友说，他和守边牧民坚持通过放牧的方式捍卫领土，与手握钢枪的外国士兵面对面也不曾后退。

1973年，魏德友骑马沿着没有边境设施标记的“争议区”放牛，发现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等到飞机离开后，他在盘旋区域内寻觅可疑迹象，发现两串朝向境内的脚印，向连队汇报展开地毯式搜索，最终可疑的人退回到边境线以外。

年逾古稀的魏德友仍没有“退休”的想法。有一次巡边遭遇暴风雪，迷失方向的他被困5个多小时。儿女担心父亲的安危，央求他回家养老，但一直没能说动。

魏德友的妻子刘京好告诉记者，对边境，魏德友有割舍不下的感情，一天不到边境看看，就感觉少了点东西。

“现在走了，以前不就白守了”，魏德友说完向着羊群小跑一阵，像是示意记者：自己身体还硬朗得很。

50台收音机

魏德友脖子上总挂着1台黑色收音机。这是两年前赶集的时候花80块钱买的。收音机掉漆的地方锈迹斑斑，坑坑洼洼的摔打痕迹记录着岁月的磨砺。

对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的老人来说，收音机是除妻子刘京好之外的另一个“老婆”——放羊的时候，巡边的时候，种菜的时候，机子不会离身。

“除了睡觉，其他时候都开着。”草原上信号不稳定，只能搜到4个台，但有新闻、能听歌，魏德友已经知足了。

草原风大夹带着沙土，收音机特别容易坏。从1964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六一团兵二连屯垦守边至今，魏德友整整用坏了50台收音机。

年代不同的50台收音机，是魏德友52年守边历史的见证。

50年前，24岁的魏德友与30多名北京军区集体转业军人，风尘仆仆地走进一六一团兵二连，一个地名叫作别尔齐的地方。

当时的连长张万台说的话魏德友到现在都还记得：“1962年，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导致成千上万的边民在‘有边无防’的状态下，裹挟牛羊，从咱们这一带逃往苏联。兵团派武装民兵第一时间在此地建立哨所、执勤点。我们新组建的兵二连，来到这里执行‘代耕、代牧、代管’任务，就是为屯垦戍边而来，就要用‘南泥湾精神’创建新家园。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

钟爱戎装的魏德友听了这番话心里也好受多了，他舍不得这身军装，“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他庆幸自己选择了兵团。这之后，他还从山东老家把媳妇刘京好接到别尔齐的地窝子里结婚成家，使艰苦的日子有了许多温情。

从此，“家住路尽头，种地是站岗，放牧是巡逻”成了魏德友日常生活的写照。他与兵二连的干部职工一起，每天放牧巡逻，与战友一起在辖区西巴里坤、萨尔布拉克、额敏河南畔，构筑了长达20公里移动的界碑，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领土。

兵二连戍守的边防线上，到处都留下了魏德友放牛巡逻的足迹。他经常劝返临界人员，受到团场、连队的表彰，连年上光荣榜。他入了党，还被九师党委授予劳动模范称号。这也是他人生最风光的时期。

1981年兵团恢复建制以后，兵二连所属地交给了裕民县管辖。由此，兵二连百余



户人家、300余口老少，分批陆续撤离了屯垦戍边20年、“绿荫环绕，瓜果飘香”的家园。1984年，一六一团牛群被拍卖，魏德友也要从兵二连搬迁至别的连队工作了。他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停薪留职，买了3头牛、20只羊，在全团率先发展养殖业。说到底，他就是不愿离开兵二连。

说来也巧，时任辖区边防站连长的白松找到魏德友说：“老朋友，你既然决定不走了，我想把用于改善战士生活的羊群交给你。还有，牧民搬走后这里成了荒凉的无人区，即便是牧民搬回来，牛马羊在没有边境设施的状况下易造成涉外事件。你有戍边经验，请你当护边员，行不？”

魏德友一口应承下来。

就这样，半个多世纪以来，昔日战友陆续告老还乡，边防战士一茬接着一茬，就连世代代住在草原的牧民也都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定居点。而魏德友却选择留下来，独自生活在空旷的草原深处。

他可以过得更好

孤零零矗立在草原的土坯房，就是魏德友简陋的家。

用报纸糊的“天花板”已经泛黄，1张木头桌子歪扭地立在坑洼的泥土地面上，家里只有4张凳子，来人多了只能坐床上。

房子里没有通常照明电。窗台前6伏功率的太阳能发电机每天只供两个灯泡的简单照明和手机充电；除了收音机和手电筒，房里再也看不到其他电器。

夫妇俩吃的米面需要小女儿翻越几十公里牧道才能送进来，喝的是门口井里打出来又咸又苦的盐碱水。

十年如一日，魏德友和老伴就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而原本，他们可以过比这好得多的生活。

从兵团退休的时候，魏德友每月能领到将近3000元的退休工资，加上妻子刘京好的2000元，足够老两口安享晚年。

魏德友在连队有1套房子，但至今他也没有去过1天。

前几年，刘京好感染了布鲁氏杆菌。这种寄生在生羊肉的病菌发作起来会导致发高烧、浑身疼痛。刘京好时常要到城里的医院住院，留下老伴一个孤零零守边。



魏德友在连队放过牛羊、喂过猪，退休后还替别人打工代牧过。魏德友的手一次粉碎草料的时候被卷进了机器里，拔出来后10根手指头都血肉模糊，露出了白骨，右手食指只剩下了半根。

艰苦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从未让魏德友退缩过。“只有守在这里，心里才踏实。”这个信念一直植根在这名老党员的心里。

更让人感慨的是，兵二连原来的党支部早在1984年被撤并了，而魏德友几十年里没落下一分钱党费，有时托人代缴，有时亲自到30公里外的团组织科缴纳。过不上组织生活，他就到边防站与兵娃娃们一起学习，更多的是从收音机里聆听党的声音。他说：“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努力做一个与党员身份相符的人。”

按说，魏德友完全可以雇人放牧落得个轻松。刘京好说：“省钱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他放心不下这里，他老说，万一边境有个风吹草动这辈子就算白守了。每天不去溜一圈，不拿望远镜望一望，睡觉都不会踏实！”

古稀之年，身体的毛病也多了起来。前年，魏德友突发轻微脑梗，妻子雇人临时放牧，把他送进了医院救治。没两天妻子被他赶回家。他也像丢了魂一样，病情稍有好转就坚决要求出院了。魏德友有老胃病，犯病时疼起来有时在地上打滚。

儿女们央求父母回山东安享晚年。魏德友拒绝说：“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等干不动了再说吧！”

前年，女儿魏霞在团部为他们买了楼房，魏德友说：“等哪一天身体真的不行了再搬家吧！”

无奈，魏霞决定从山东回来。她说：“哪怕是我去萨尔布拉克接他们的班，放牧守边，延续他们的念想，也要让父母到城里养老！”

2003年仲夏，中、哈两国境界桩、围栏、国防公路等设施在魏德友眼皮底下贯通。兵二连人曾舍身捍卫的争议地界尘埃落定。魏德友成为兵二连唯一见证这一庄严时刻的人。他激动地抚摸着中国第173号界碑，流下了悲情的泪水。

如今，在萨尔布拉克，就剩下了魏德友一家人。他的话是那样质朴：“留在萨尔布拉克，守牛羊是守住生活希望，守边防是留住心中念想。”

创业者之歌

——记左振素

胡爱军

今年是公元2016年。40年前，经当时的临沂地区领导机关批准，临沂市中医医院前身“临沂地区新医医院”正式成立，它成为我市首家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重点医疗机构，这是改善沂蒙老区医疗条件、保障人民健康、推进地方医疗事业全面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建院初期，地区卫生局从有关单位抽调了一批具有中医药专长、有志于开拓中西医结合医学领域、有经验的医生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从应届大中专学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医学专业学生，充实到新医医院。这些人，成为市中医医院的首批创业者。当年，在这支优秀的创业者队伍当中，有一个刚从山东中医学院毕业的姑娘，英姿勃勃，沉稳老练，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本文向大家介绍的主人公——左振素老师。

一、从不懂医术的“医生”

到省内著名中医专家、全国名中医师承指导老师

左振素老师今年65岁，她的家乡是“智圣”诸葛亮故里山东沂南县。她16岁初中毕业回乡，22岁考入山东医学院，25岁大学毕业分配到临沂市中医医院工作至今。她悬壶行医40余载，誉满杏林，桃李芬芳，硕果累累，其人生阅历也丰富多彩却又充满波折。

与医药结缘 左振素在其《临证经验辑要》一书的“自序”中说：“我与医之缘，当缘于农村缺医少药对我的鞭策”。1968年，她初中毕业，回到自己的家乡沂南县河阳公社左泉村。那个年代的农村，初中毕业生就是了不起的文化人。在乡亲们眼里，左振素这个“文化人”无所不通，无所不能。甚至村里的农机、电磨坏了都要“找振素”来修理。后来，公社卫生保健站体制改革，站里原有的工作人员多数下放返回原籍，缺个有文化的人记账，左振素顺理成章成了保健站的“会计”。从此，她与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回忆说，那段时间，保健站只有一个医生和她两个人，医生经常出门巡诊，她的工作便是看



门值班。原来保健站曾有一名中医，中药也比较齐全，虽然中医下放回家了，但仍时常有人带着药方前来抓药，于是，她又担起了司药这份工作。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一来二去，很快熟悉了药橱上标注的常用中药的名称。谈起这段往事，左老师不无风趣的说：“那时候我才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什么也不懂，对中医中药一无所知，也有出错的时候”。她讲，有一次给人抓药，那人的药方上写有“滑石”一味，但药橱上盛滑石的药斗是空的，她从来没见过“滑石”是什么样子，当时医生不在，又无人可以请教，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到库房翻找。她想，既然此物名叫“滑石”，肯定与石头有关。她在库房看到一个木箱中有些红色的石头样的东西，没有标明药名，心想这个可能便是了，于是用斧子敲碎，给人家过了称包装好拿走了。那人再来取药时说，他在别处取的药里只有白色的像面粉样的东西，没有红色的石渣，是不是搞错了？后来经请教医生才知道，是自己错把“赭石”当“滑石”了。幸好这两味药都没有什么毒性，与其他药物也不相反相克，才未酿成大错。事后想想，着实的后怕。就这样，左振素在一无教材、二无培训的情况下，通过跟师实践，耳濡目染，历时一年，居然也学会了一些基础的医药常识和医护技术。再后来，保健站唯一的医生因政治运动进了“学习班”，左振素改行当了民办教师，保健站就此“关门大吉”。左泉村这么一个2000多人口的大村，与当时“老、少、边、穷”地区的许多地方一样，成了农村医疗覆盖的“盲点”。由于左振素一年多保健站工作的阅历，她在乡亲们眼里已然就是“医生”，谁家有个头疼脑热、跌打损伤，还是到她这里求医求药。这种状况令左振素心急如焚，她由此萌生了当医生为乡亲解除病痛疾苦的念头。1973年，左振素由公社推荐，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考入山东医学院中医系，终于圆了她的学医之梦。

防震棚里的笑声 1976年，左振素大学毕业，分配到地区新医医院工作。这一年，是我们国家极不平凡的一年：深受人民爱戴的三位伟人相继辞世；“7.28”唐山大地震，30万同胞在震中罹难，一座现代化煤城夷为平地；这年10月，以打倒“四人帮”为标志，结束了为期10年的“文革”内乱，人民欢欣鼓舞，事业百废待兴。也就

在这一年，临沂地区新医医院正式挂牌开诊。左振素与其同期分配的来自省内各医科大中专学校毕业的十几位年轻人，为这所初创的医院增添了勃勃生机。当时的新医医院，还是远离闹市的偏远郊区，四周是开阔的田野，院子就是一个建筑工地，只有一座刚刚竣工的三层楼兼作门诊、病房和行政、后勤办公之用。职工宿舍是用木桩和芦苇临时搭建的防震棚，左振素们住进去的时候正值初冬，早晨一觉醒来，脸盆里结了一层薄冰，绳上的湿毛巾已经冻的硬邦邦了。防震棚里，男、女生宿舍包括有家室的院领导的“寝室”，仅一席之隔。夜间，隔壁的人磨牙、放屁、打呼噜，这边听得一清二楚。第二天，人们调侃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你们那边谁谁昨晚说的什么梦话、讲的什么笑话。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这些年轻的创业者们仍然保持着旺盛的乐观主义精神，每天坚持出操跑步，积极参加建筑工地劳动，终日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在这片崭新的弥漫着泥土芬芳的园地里，左振素和她的同伴们就此展开了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理想翅膀。

精勤不倦，学无止境 左振素经常告诫她的学生和弟子，习医之人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精术”为“立德”之本，“精勤”为“精术”之道。做一名良医，必须具备精湛的医术才能造福于病患，而勤奋好学、持之以恒则是提高医术的唯一途径。这方面，她为人师表，身体力行，平素里博览群书，深研经典，中西并举，内外妇儿各科兼修，广泛涉猎各类临床治则方药，努力丰富和提高自己。只要一有机会，就积极争取参加各级举办的学习班、进修班、研讨班。六十岁之后，仍积极参加各级举办的医学学术研讨活动，以了解和掌握国内外最新的医学科技动态。她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实践和研究，对当前各类疾病致病因素和疾病谱的改变提出了新的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对内科疑难杂病特别是风湿病，注重从热、痰、瘀等致病因素入手进行诊断，对风湿病的治疗不仅仅拘泥于风、寒、湿，而是针对病情活动与否以及病变过程中的痰瘀征象，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祛痰为主要治则，此法在临床应用中每获捷效。同时，她对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等多种内科疾病都有独到的临证思路和有效的治疗方法。由她主持的“狼疮肾炎从痰瘀论治的临床研究”、“肾复宁结肠滴注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等项目，分别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和临沂市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由她主持和参与的“消蛋白合剂治疗肾性蛋白尿的临床研究”、“降黏胶囊治疗高黏滞血症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从痰瘀治疗痛风观察对血尿酸影响的研究”、“橡皮槌疗法治疗急性腹泻的临床研究”、“中风综合预防措施及先兆症状早期诊治的临床研究”等项目，均获得了临沂市科技进步奖项。她于1987年晋升为主治医师，1993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1996年，担任山东省中医药学会首届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并连续担任这个专业委员会的第二、三、四届副主任委员。1998年，担任市中医医院内二科主任和风湿病科主任。2000年晋升为主任医师，同年被推选为临沂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2007年，被评为山东省名中医。2008年和2012年，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她成为第四批、第五批全国名老中医师承指导老师。2008年至今，为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指导老师。

这些年，左振素门下可谓桃李如云，人才迭出，但凡经她传授过的学生弟子，对为师这种持之以恒、皓首穷经的刻苦精神无不赞佩有加。

厚重的“家祭” 这些年，左振素在事业上硕果累累，为人称道，但其人生和家庭却经历了一段令人唏嘘感慨的波折。她38岁那年，儿子刚满8岁，与她相濡以沫的第一个丈夫罹患绝症。她非常坚强的承受着命运带来的不幸，白天，强忍内心痛苦，照常面带微笑应接前来诊治的患者；夜晚，就住在病房护理自己的亲人，饿了就啃口干煎饼，累了就趴在病床边迷糊一会儿。从丈夫住院到去世一共3个月时间，她没睡

过一个囫囵觉，没耽误一天工作。丈夫的去世，让她陷入极度悲痛之中，但她很快振作起来，决心忍住悲伤，排除它念，集中精力，加强学习和钻研业务，同时倾注心血教育和培养儿子，以自己业务上的进步和儿子的健康成长这一特殊方式来告慰逝者。打那之后，她既当娘又当爹，家庭事业一肩挑。每到晚饭后，母子二人就坐在灯下，各自学习，相互安抚。一年后，左振素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重要医学专著、32万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疑难病》书稿，该书于1993年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在她的影响和精心照料下，儿子也好学上进，学业有成，后来赴俄罗斯留学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成为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这份沉甸甸的“家祭”着实令人刮目相看。现在，她新组建的家是一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她先后送走了五位老人，她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并且成了祖母，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的井井有条，和和睦睦。为此，这个幸福的大家庭被评为山东省“平安家庭标兵户”。

二、国家级重点专科建设的“掌门人”

临沂市中医医院历经40年寒暑，已经发展成为今天的国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是目前鲁南地区最大的以中医、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医疗、急救、康复、科研、教学和技术指导中心。“三甲医院”是我国现行《医院分级管理办法》中等级划分的最高级别，其中一个重要资质，就是参评医院必须具有两个以上国家级重点专科临床科室，市中医医院原来由左振素领导的“风湿病科”就是其中之一。

风湿性疾病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其内容几乎包括了所有的骨、关节及软组织疾病，具体有免疫性、代谢性、感染性、退行性、遗传性及内分泌性等等。风湿病由于起因复杂，病程长，易复发，治疗棘手，长期以来被列为世界难治性疾病之一，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顽疾。

市中医医院于1995年开设风湿病门诊，创始人是著名风湿病专家、主任医师、曾任本院副院长的朱晓明先生及其传承弟子夏俊杰、曹忠贞。1998年，左振素先后参加了全国中西医结合风湿病高研班（北京）、全国风湿病学习班（杭州），系统学习了风湿病的基础知识及临床治疗。风湿病科正式成立后，由左振素担任科主任，同时她被市中医医院确定为风湿病学科带头人。从此，她对风湿病学及其临床诊治潜心研究20余年，为重点科室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左振素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风湿病科于2000年被山东省卫生厅确定为省级重点中医专科建设单位；2002年，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确定为国家重点专科建设单位；2004年被省卫生厅确定为山东省重点中医专科。2012年，在上级组织的“三甲中医医院”复审工作中，风湿病科以国家级重点专科的资格参加了“三甲”医院的检查评估。

20年来，在左振素和几任科主任的带领下，风湿病科集临床、教学、科研于一体，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在风湿病防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成果。在临床中，左振素和同事们坚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分期论治及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临证思路，坚持中西医结合的特色疗法，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他们借助现代化临床检验手段，开展了荧光法抗核抗体（ANA）、抗双链DNA抗体、抗核提取物抗体测定（抗ENA抗体）、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抗线粒体抗体（AMA）、类风湿因子（RF）、HLA-B27、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CCP抗体）等风湿免疫检测项目，使风湿类疾病得到早诊断，早治疗。同时，发挥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优势，积极开展中药熏蒸、离子导入、艾灸、穴位贴敷、中药湿敷等特色疗法，积极开展风湿病自制药品的研发和创新，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实施个体化治疗。尤其是采用中西医结合

疗法，有针对性的治疗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干燥综合征、骨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等疾病，疗程短、疗效好、治愈率高、复发率低，深受众多患者的赞许，因而就诊患者地区辐射范围逐年扩大，专科知名度不断提升。

20年来，风湿病科共承担各级课题20余项，获得专利1项，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期间，由左振素撰写和主编的《风湿病系统损害鉴别》、《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病》等多部医学专著，在业界备受关注。特别是《风湿病系统损害鉴别》一书，是左振素多年来从事风湿病研究和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该书对常见风湿病骨、关节、肌肉的表现特点以及风湿病在各系统病变的表现特点，进行了系统的简明扼要的比较与鉴别，能够帮助读者尽快掌握风湿病的临床特点、诊疗要点和治疗方法，作者还详细介绍了自己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体会及诊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处理措施，为读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因而，此书成为风湿病临床工作不可多得的教材和工具书。2012年，经山东省卫生厅批准，市中医医院建立了山东省“左振素名医工作室”，风湿病科以此为依托，总结左振素经验，搜集病历，撰写论文，集学术继承、科研、临床于一体，积极开展名中医工作室工作，科室整体水平得到较大提高。

市中医医院风湿病科是一个名师满门、人才辈出的优秀群体。左振素等本院4位名老中医皆出自风湿病科。主任医师夏俊杰，山东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山东省中药药师承指导老师，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40年，对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骨质增生及肺纤维化等风湿病有丰富的治疗经验；治疗急慢性肾病、肾功能不全等疾病，疗效突出；治疗胃病及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等妇科疾病，有独到之处。硕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周明爱，左振素的入门弟子和爱徒，是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风湿病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尤其擅长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干燥综合征、皮炎、痛风等风湿类疾病的中西医治疗。现任风湿病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朱孟铸，师从国内知名风湿病专家王吉波教授及北京协和医院田新平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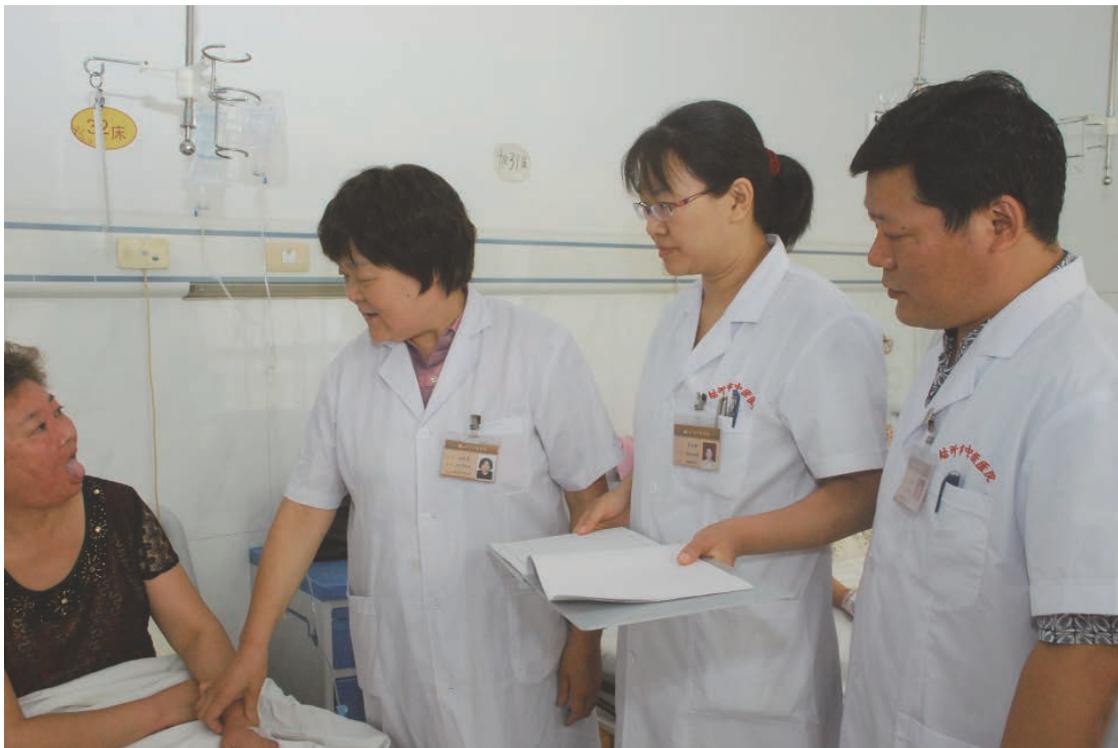


授，擅长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硬皮病、血管炎等风湿性疾病。他有多年内科及急诊科工作经历，基本功扎实，熟练诊治各种病症。经过20年发展，目前风湿病科专业医师队伍达到14人，其中高级职称5人、中级职称6人，硕士研究生导师2人，硕士研究生9人，名老中医4人，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1人，是一个老中青梯次搭配、中西医结合、实力雄厚的风湿病专业医师团队。

三、“大医精诚”的践行者

“大医精诚”是左振素几十年来行医的座右铭。《大医精诚》出自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第一卷，是一篇论述医德的重要文献。它主张，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同时，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之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且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这些理念的传承与发扬，对当代医德思想建设影响深广。左振素说，“大医精诚”作为行医的最高境界，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只要能身体力行，就是一位好医生。

“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是左振素一贯的医风。她认为，医乃仁术，当有仁心。仁心包括善心、诚心和奉献之心。病人不仅饱受疾病折磨的痛苦，还会遇到很多困难，诸如交通不便、经济困难等等，以至患者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为此，医生应该时时为病人着想，处处体谅患者的难处，同情关爱每一位病人。有一次，她接诊一个外地病人，已经到了中午下班时间，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病人急着要赶下午的返程车回去，心急火燎。左老师宽慰他：“不要着急，给你看完再下班”。待病人拿到化验结果，诊断完毕，时间已经拖了近一小时。此举令病人感激不已，左振素向他解释道：“我晚下班半小时，你就能早回去2小时。你若赶不上车，耽误的时间更多，弄不好还得花钱住店。我们这样很划算的”。还有一次，一位家住黑龙江省的患者慕



名来到市中医医院找左振素求医，患者因路远不便，要求带半年的药回去治疗。左振素担心，这样既不便于观察药物疗效和不良反应，又会加重病人经济负担，于是便通过电话与患者建立了远程诊疗“热线”，随时指导病人检查病情及用药。经过左振素一段时间的精心指导，现在这位患者恢复的非常理想。左振素坐诊时，有的患者或因经济拮据或因带钱不够而身处窘境，每逢这种情况，她便慷慨解囊给予资助，少则3、5元，多则几十元、上百元。这些事在她眼里都是小事，以平常心，做平常事。她说，能够以我们的举手之劳为患者解除燃眉之急，也算尽了一份做医生的功德心。

不“自逞俊快，邀射名誉”，不“恃己所长，经略财物”，是左振素一贯坚持的行医准则。笔者第一次采访她时，她非常谦逊又幽默的自我介绍：“我就是个普通医生，就是个干活的”。左振素是山东省名中医，是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第四批、第五批全国名老中医师承指导老师，还是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指导老师，在省内各级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曾经获得过许多荣誉，是中医界德高望重的人物，但她从不拿这些“头衔”和荣誉作为炫耀的资本。在她心目中，“头衔”和名声只不过是虚荣，祛病疗疾、救死扶伤、造福社会，才是一个医生的本分和职责。在临床中，她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本着简便、廉价、安全、有效的原则选择治则方药。她对社会上曾经流行的药厂“药代理”靠“送红包”、拿提成的办法推销药品的行为嗤之以鼻，她告诫自己的学生弟子：当医生不能见利忘义，不能让病人多花一分冤枉钱。有一次，一位农村妇女到左振素这里就诊，时值盛夏，病人身上却裹着厚厚的棉衣。病人走进诊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关掉电风扇，然后才开始诉说病情。她告诉左振素，自己自从得了这个病，已经有两个月不能干活了，家里为她治病花掉了3000多元，病情丝毫没有好转。病人自认为得了绝症，精神恍惚，说这次来大医院看看，如果没救了就只有回家等死。左老师详细询问了她的病史，经仔细观察病情，认为患者仅仅是感冒后误诊误治才导致现在这个样子，并没有什么大病。她首先对病人做了耐心的心理治疗，然后教给她调治的方法，又给她开了3剂中药。半个月后，病人痊愈了，3剂药一共才花了15块1毛钱。为此，左振素深受众多农民患者的信赖，称她为“庄户人的好医生”。

左振素高尚的医德医风受到业界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多年来，她连续被评为本院先进工作者、医德高尚的医务工作者、“十佳医生”、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和市直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2000年，被评为临沂市先进职工；2002年获临沂市“振兴沂蒙”劳动奖章；2003年，被评为临沂市中医先进工作者。2004年，她作为“全省卫生系统行风建设先模人物巡讲团”成员，在全省卫生系统作了个人先进事迹巡回演讲，2005年获山东省行风建设先进个人称号。2007年，被评为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2009年5月，被评为山东省中医工作先进个人并记二等功。

“振兴国医，素面人生，精诚为本，勤奋耕耘”，可以说是左振素老师从医40年来的真实写照。其医德、医术和学术精神，彰显一代创业者的大师风范。我们深信，有他们这一代献身国医的大师们的引领和带动，宝贵的祖国传统医学一定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大有作为。

临沂市副市长赵爱华调研方志馆建设工作。8月2日，临沂市政府副市长赵爱华到市史志办调研方志馆新馆建设进展情况。市政府督查室主任秦鸿伟，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副主任段洪等陪同调研。

赵爱华一行到新建市民服务中心实地查看了方志馆新馆址，听取了市史志办关于新馆筹建、布展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了下一步工作打算及存在的困难问题。赵爱华要求市史志办加快工作进展速度，尽快完成展厅布展等工作，争取新馆早日投入使用，对外开放；着力把新方志馆建设成为集方志编修、收藏、研究、开发利用于一体的优秀基础文化设施，成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地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市派第一书记精准发力、光伏产业助力脱贫攻坚。8月26日上午10时整，在郑旺镇供电所工作人员、英利公司技术人员和宋庄村广大村民的共同见证下，河东区郑旺镇宋庄村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扶贫项目正式并网发电。

宋庄村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扶贫项目，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程序完成招投标，山东英利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承接该项目。项目总投资100万元，建设在村驻地贵民食品厂厂房房顶上，总装机容量为132kW，安装面积约2000余平方米。项目实施后，年收益约19—25万元。

史志办、市妇联联合莱商银行、万博泓公司走进第一书记任职村“助力精准扶贫”。9月10日上午，市史志办、市妇联联合莱商银行、万博泓公司走进第一书记任职村“助力精准扶贫”捐赠仪式在河东区郑旺镇政府大会议室举行。

仪式上，爱心企业莱商银行临沂分行、万博泓公司分别向第一书记任职村河东区郑旺镇宋庄村集体捐

赠5万元救助款、价值43650元的爱心衣物。随后，村集体向10户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发放救助款。

市史志办到龙须崮暴动遗址参观学习。9月1日，市史志办部分党员干部到蒙阴县岱崮镇龙须崮暴动遗址参观学习。

市史志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二专题研讨。9月22日，市史志办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二专题研讨，与会党员畅所欲言，扎实研讨交流，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向纵深开展。

市史志办组织收看“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10月21日，市史志办组织全体在职干部职工收看了“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并随后进行了讨论。

市史志办认真贯彻落实市直机关党组（党委书记）工作会议精神。9月28日，市委召开了全市市直部门单位党组（党委）书记工作会议。

市史志办高度重视，积极部署，通过多项举措认真贯彻落实有关会议精神。将全市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到单位党建工作各个方面，力争在市直部门中走在前列；10月中旬研究通过了“弘扬沂蒙精神、做好党建文章、助推史志发展”教育活动实施方案；在沂蒙史志官方微信、智慧临沂手机APP等史志网络平台推送党建信息，创新党建网络新阵地建设；在前期于临沂市情网上设立“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栏的基础上，积极贯彻落实市委组织部在部门单位官方网站开设“党建栏目”的要求，于10月中旬又增设了“机关党建”栏目，及时宣传单位党建工作动态，公示相关党务内容。

山东财经大学到郯城县开展“读县志 懂中国”暑期调研。8月3日，山东财经大学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郯城分队一行4人，到郯城县史志办

开展“读县志，懂中国”调研。此次调研活动是山东财经大学“读书向学”的具体探索，旨在让同学们开拓眼界，从县志中对话历史，读懂中国。

临沭县史志办学习贯彻《关于做好乡镇村志编修工作的意见》精神。9月2日，临沭县史志办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省史志办《关于做好乡镇村志编修工作的意见》精神，并结合单位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具体贯彻落实措施。

临沭县史志办于2015年选取青云镇和朱村作为试点，启动乡镇村志编修工作。目前，《朱村志》已完成初稿，《青云镇志》初稿编写工作也接近尾声。

沂南县史志办创新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沂南县史志办党支部坚持教育与实践并重，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采取“微党课”“送学上门”等形式给党员上党课，迅速掀起学习教育热潮。

沂水县史志办开展史志成果进机关活动。9月8日，沂水县史志办与县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进行结构化研讨交流工作。交流结束后，县史志办向县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赠送了4套清康熙、道光《沂水县志》。

兰山区启动区志编修工作。9月21日，兰山区召开区志编修工作会议，部署首部区志编修任务，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区委书记耿学伟专门向会议致信，副区长宋敬华参加会议并讲话。10月20日，兰山区召开《临沂市兰山区志》编修业务培训会议，对114个区志承编单位近200名主笔及业务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